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ZHONGGUO MAKESI ZHUYI YANJIU CONGSHU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基本认识和实践

曹泳鑫 著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JIBEN RENSHI HE SHIJIAN






上架建议：政治理论



ISBN 978-7-5486-0735-9

9 787548 607359

定价：2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ZHONGGUO MAKESI ZHUYI YANJIU CONGSHU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基本认识和实践

曹泳鑫 著



版社

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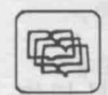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认识和实践 / 曹泳鑫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 1
ISBN 978-7-5486-0735-9

Ⅰ.①马… Ⅱ.①曹… Ⅲ.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Ⅳ.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0649 号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认识和实践



作　　者—— 曹泳鑫
责任编辑—— 李西曦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021-64515005
网址：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www.ewen.co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4 万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6-0735-9/B·36
定　　价—— 28.00 元

# 总　序

方松华

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立以来，本所的同仁一直怀着一颗壮志雄心，希望从“学术系统的建构”、“话语体系的建立”、“学科体系的建设”、“国际比较的视野”与“学术档案的确立”五个方面来建构一个原创的、完整的、经典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此，酝酿、撰写并出版多卷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乃是这种心愿和如下使命所在：

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近现代中国思想、理论和学术的主流，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道统”。它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之理论基础的意义上已经成为潜在地支配或影响当今中国历史走向的新的思想或精神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方面作为学术史、思想史或精神史，它所反映的是现当代中国在由民族走向世界史的过程中，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相互交流、碰撞、矛盾、冲突和融合中，参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并以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导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历史；另一方面，作为与政治和社会运动高度相关的理论史或意识形态

史，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这一恢弘的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表达，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法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的现实理论主题，它的发展水平、理论境界和历史视野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状况、历史远景和未来前途，关系到当代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对于古今中外问题、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等时代主题的历史解答。

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先秦以来，诸子百家筚路蓝缕，共启中国学术之山林。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一直到五四时代，传统儒学受到致命打击，遂有多元学术思潮之兴起。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十余种学术思潮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并在新中国建立后荣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

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成功应对了三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一是成功应对了来自中国传统和保守势力的挑战，承担起近现代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二是成功应对了来自苏联道路或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的挑战，在艰辛探索中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三是成功应对了来自西方自由主义的挑战，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信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使命之一，就是在与当代各种学术思潮和和思想流派的充分对话中，实现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理论建构，让马克思主义具有当代中国的理论元素、理论经验和理论内容，从而构建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需要的、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和自我辩护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和学科体系。

从学理方面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引领现代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学说，需要深入的历史与逻辑的建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学术史在中国传统中有着“道（原理）与术（运用）”的意蕴，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只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有着自身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脉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论争、创建的各个时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与世界观的传播与确立；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与逻辑发展，厘清、阐释乃至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要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与文化的主潮、引领20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从学术论战的角度而言，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思潮的比较与论战的结果。绵延近一个多世纪的学术论战，无论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还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抑或是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伟大思想、西方优秀的现代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智慧相融合，创造性地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

## 二

当代中国，各派学说纷纭、各种思潮激荡。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条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套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从“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哲学式阐发，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中国话语表达形式，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潮。因此，发掘和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是我们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内容，这不仅仅是一个外在形式的表达，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刻内涵的彰显。

考察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史，虽然近百年来各种学术思潮兴盛，但是大多匆匆而过，深度明显不够。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术思想的原创性不足，在学术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方面，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中国的话语系统，更不用说“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征”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在学术话语的思想内涵的建树方面，还存在很大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大多是模仿或引进西方模式，诸多现代中国哲学家曾经非常努力地试图构建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可惜大多没有成功，其原因也是在于没有确立中国本土的话语系统。因此，如何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和实践话语以学术话语的形态，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更深刻的学理支撑，并转化为日常话语提供中介，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为此，我们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演进的基本经验、教训和路径进行探索：(1) 根据实践主题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进程中坚持其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提炼总结和对斯大林模式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消极影响的反思。(2)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的理论思辨：特别要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其他学科学术话语、实践话语、日常生活话语的关系。(3)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的路径探索：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解释力和影响力；以求得话语批判和吸收借鉴的结合；内在理路和外在形式的统一。由此，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不仅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三

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引领着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旨在探索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创新中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正如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人思想发展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史,它还应该包括所有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尤其是职业学者的学术史。这无疑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理论、思想和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之一。

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大机遇,其中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艾思奇、冯友兰、冯契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何其芳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方面;孙冶方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发展作出了新的成绩。这些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经典,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一道,共同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这个时代的巨大主题。

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回顾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有着不同的特征。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学科体系或知识建制(苏联模式),各门学科都形成马克思主义原理性质的教科书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原理性的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的)解体,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引进,马克思主义被设定为基础性的学科门类,引领并与其他学科共同发展。但是,学科建设仍然有许多方面需要探索:(1) 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指导性地位,需要重点考察这种指导性地位产生的历史缘由和内在的合理性;(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科之间的具体关联研

究，需要重点梳理职业学者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宗教、文艺、历史以及其它具体学科的发展要求相结合时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之间的具体关联研究，需要重点梳理职业学者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的发展相结合时，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以及所遭遇的重大学术困难；(4) 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学科化努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需要重点考察延安时期、建国初、改革开放后，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自身体系化和学科化的种种努力、成就和经验教训。

## 四

中国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歧出，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与中国传统智慧的结合所结下的丰硕果实。由国际视野来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而且在当下的实践中正努力践行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热议、争论、评判和反思，已经成为当前各主要思潮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重心之一。对于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主要左翼思潮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在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想，信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开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人类文明样式。为此，我们应当拓宽理论视野，将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关于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史和改革史的研究，关于中国道路、中国体制和中国模式的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从外部世界来对照、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理论和现实过程。

## 五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亟需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历史资料长编，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学术论战、重要学术文本汇编成经典史料，用纸质和数据库的形式面世，尽快抢救许多散落和轶失在解放前出版的书籍与报刊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资料。以求为今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学术史奠定比较丰富可靠的史料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主义研究在当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

第一，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学术基础。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发掘学术资源的层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的根本主旨就是要在中国经验、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学术积累和学术发掘的意义上，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可以为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能力奠定学术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与党的理论创新能力——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创造力的根本体现——有着本质性的关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可以为提升党的理论境界和理论水平，增强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奠定坚实的思想和学术基础。

第二，研究和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史的地位，原创的、完整的、经典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掘与建构，填补这一近乎空白的领域，更是为我们党和国家乃至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盛事，这就像中国先哲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工作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这一现当代中国的新传统或新“道

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是以20世纪中国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史为现实依托的，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新的历史和思想传统，成为当代中国的新“道统”，当代中国所折射的诸如古今问题、中西问题、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都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和思想传统中得以展现和解答，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就是在学术传承的意义上继承马克思主义这一新传统或新“道统”。

第三，从学理上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我们常常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选择，比以往经验的阐释更进一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旨在从学术系统、话语体系和学科建设、国际视野等方面来对这一论断进行阐述和论证。

第四、可以在思想和学术的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积累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创一种新型的文明和社会类型的可能性（如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可以揭示出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破解“历史终结论”，为中国和未来世界开辟新的发展愿景。

# 目录 | Contents

# 序 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似乎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上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与百年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巨大变革都密切相关。可以说，缺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当代中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当今中国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解读，而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些关于中国的解读肯定失于偏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商品经济和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变得兴趣淡然，许多人的理解变得肤浅或流于形式，感觉似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开现实渐行渐远或已经不太重要。鉴于此，有必要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认识和实践上的若干基本问题加以简要论述，以便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及其对中国的重要性。

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侧重点至少通过以下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提出并阐释，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知道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几大理论成果和在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上的伟大成就，而且要明白除此之外全方位的巨大成就，书中通过例举中国人思维方式变革、中国主流文化变迁、民族解放、妇女解放、新型军队诞生等，引导人们去

发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方面成果。其二，从源头到当今，简要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程和内在逻辑，阐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内在关联。其三，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治学方法和态度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涉及知识庞杂的命题，并非缺少学术性，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应尊重历史事实，注重文献资料查证，既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实践阅历，又要具有历史发展的眼光和国际视野。

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读懂上述意蕴。

# 第一章
#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思想

## 第一节　中国人早期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的认识演变

### 一、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运动、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最早认知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学说、运动和对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说）创始人马克思的认知最早什么时间、最早什么人、最早的文献证明等，虽然已经有说法，但还有亟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之处，其中包括几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一）中国人最早如何知道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总的说来，近代中国（晚清）在国门被西洋人武力打开，中国开始有人（主要是外交官）走出国门，首先在欧洲开始知道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及其学说，之后的了解则是经外国传教士的翻译介绍，再后来是留日学者的学习、引进和介绍。

而且，中国人早期先是从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巴黎公社）的认知开

始的，然后才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说。

（二）中国人最早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

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是清王朝的知识分子，虽然晚清时期国人已经认识到欧洲的强势并有了效仿甚至变革之意，但他们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和改良派的立场看待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上持敌意立场，在表述上往往恶语相加，比如用"乱党"、"乱民"加以描述。

（三）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社会主义学说、运动的历史背景

以巴黎工人起义为标志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高潮时期，对应的是中国清朝的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已经派官员到欧洲游历，开始主动了解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状况。

（四）基本文献例证

早期文献已经有一些，对这些文献的研究也已经有了一些发现，比如，张德彝（1847—1918）的游记《三述奇》（手稿本）中记述了他目击巴黎工人起义和巴黎公社的情景。王韬（1828—1897）的《普法战纪》（共14卷，中华印务总局1873年出版）则是流传更为广泛的记载巴黎公社的汇编，等等。

再如，中国近代出版的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的著作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原著为英国1892年出版的可卡朴著《社会主义史》），该书出版被看作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开始。

1899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再度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国内刊物上首次提到《资本论》书名的是1899年4月《万国公报》第123期所载《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

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梁启超（1873—1929）。1902年他在创办的《新民丛报》上撰写"干涉与放任"一

文，声称“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1904 年写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是较早关于社会主义的专论。

1902 年至 1904 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中介绍社会主义的专著主要有：

《广长舌》（幸德秋水著，中国国民丛书社译，商务印书馆 1902 年版）。

《社会主义》（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上海广智书局 1903 年版，该书另有其他版本），该书也被誉为日本第一部真正的社会主义文献。

《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 1903 年版）。

《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1903 年连载于上海《新世界学报》第二期至第六期）。

《社会党》（西川光次郎著，周之高译，上海广智书局 1903 年版）。

《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译社译，1903 年 10 月由《浙江潮》编辑所出版，后有其他版本）。该书被认为是日本明治时代最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文献之一。

## 二、中国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认识上的混乱

由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真正传入中国时间上的滞后和数量上的极其有限，所以即使有一些中国人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但很难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几个方面基本问题。

### （一）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中国后的认识和反应

在有了较多的引进外国书籍资料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人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早论述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包括价值判断和运用取舍，有几种主要表现：

1. 因崇尚西洋文化所致的推崇和较高评价。

2. 认识含糊不清，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混淆

对待。

3. 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混在一起。

4. 不同派别分别对平等、公有制、阶级斗争、民生、社会进化等方面各取所需。

(二) 马克思主义学说早期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20 世纪初，清王朝衰落至消亡期，社会阶层、阶级力量加剧分化，各种势力派别开始将眼睛向外寻求图存或中兴或革命的新道理，因而对西方文化大感兴趣和崇尚，马克思主义也在其中。

与此同时，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也不断呈现社会弊端、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效仿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同时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并企图加以规避。

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之后，第二国际领导人和欧洲社会主义者不断出现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视听。

(三) 基本文献例证的研究

已经有所发现的文献研究如：

1903 年 10 月《浙江潮》第八期署名“大我”的文章“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在“篇三、新社会之主义”部分主要按“共产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加以论述[①]。该文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文章，被认为是最早给社会主义很高评价的作品。

20 世纪初，一些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侨居国外(欧洲、日本等)，受到当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在欧洲和日本分别成立了两个无政府组织。在巴黎成立了新世纪公社，推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强调科学与进步，出版刊物《新世纪》。在东京，刘师培、张继、何震、汪公权等人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成为狂热的无政府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513—516 页。

主义者，并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所”，在自己创办的《天义报》上发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等文章，竭力混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叫嚣“吾等则谓社会主义多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社会主义必有趋向无政府主义之一日”等。另外，侨居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欧洲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是，欧洲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而在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则吸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容，尤其马克思的强调阶级斗争学说，《天义报》刊有出版社会主义书刊的广告，并说《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以此入门”。

（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主义观

孙中山在1896年到英国伦敦，1903年旅居日本，1905年到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常设执行机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大量接触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的影响，在看到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制度弊端之后，甚至自称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在1905年在解释三民主义时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诸君想想兄弟提倡民生主义是在什么时候？今日国人才出来讲社会主义，已嫌迟了。但是社会主义底学说输入中国未久，兄弟将‘社会主义’原文译为‘民生主义’较好允当。”（《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6页。）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代表人物有马君武，他于1903年在《译书汇编》第2号第11期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章附有五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目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被毛泽东后来称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的是朱执信，被认为是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于1906年在《民报》第2号、3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文章，指出了马克思学说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在《民报》第5号发表

《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他关注和研究的目的在于为当时孙中山倡导的“社会革命”寻求思想资源，同样将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等同起来。

辛亥革命前后出现标榜社会主义的团体和党派，其多将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加以混同，实质上或无政府主义或个人主义和投机钻营。1911年8月，江亢虎（1883—1954）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1911年11月将该团体改组为“中国社会党”，本部设在上海，并在江、浙、京、津等全国多个地区设有分部，吸收党员条件宽松，短短几个月就在全国各地建立数百个支部，号称有几十万党员，并且办有机关刊物。该组织是中国第一个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但实际上党员真正了解或信仰社会主义者甚少，虽然其骨干分子和报刊在宣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社会主义方面做了很多有影响的事情，但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许多误导，或解释说“马氏之主张与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又未尝不相同也”，或者说“社会主义以人性为本，以人情为用”，或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自由、平等、博爱三言”为标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且根据当时政府和当权势力的需要随意更改说辞，对于当时的投机分子来说，社会主义不是他们要努力付诸实施的内心追求，而是根据需要加以鼓吹利用的东西，即所谓“中国今日或尚非社会主义实行之时代，而确是社会主义鼓吹之时代”。这一组织的创办人江亢虎先后投靠过孙中山、袁世凯、汪精卫，最后以堕落为汉奸收场。

从1914年出现的一场所谓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的论战中，也可以看出时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片面性。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刘师复（1884—1915）在《民生》杂志上对其他派别社会主义者发起了一系列攻击，包括对孙中山和江亢虎的批评，指责他们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他们之中任何人都不明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而且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甚至不了解各种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明显的证明是孙中山把马克思和乔治相提并论，而江亢虎的许多论述则混淆了无政府

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1]。刘师复自己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所作的区分是：社会主义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无政府主义不仅将经济而且将政治也包括在攻击目标之内，因此，一切无政府主义者必然也是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却不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反对政府，可以说无政府主义包含社会主义[2]。

（五）研究和回答民国建立之初为何能够容许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和组织存在，并且出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接受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其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困惑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的认识漩涡之中。

孙中山当时所幻想的是中国不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过程，直接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个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3]，或者说“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4] 他在欧洲游历时就看到资本主义的缺陷，也看到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经常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同起来，只是幻想中国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加以实现。

其二，社会革命概念往往并不具有政治暴力涵义，而许多派别把社会主义理解为非暴力运动。

例如，自喻为社会主义者的江亢虎把社会主义描述为“和平幸福之主义，非激烈危险之主义；建设之主义，非破坏之主义”。[5]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也认为社会主义非但不会成为共和秩序的威胁，反倒有助于实现共和政府的美好愿望。他们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比西方

---

① 阿·德利克、爱·克列布斯：“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江枫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4—95页。

②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3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⑤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国家更易，因为中国尚未受到西方社会深刻的社会分化和剥削之害，因此有可能避免暴力。[①]

其三，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得到当时中国民主革命派的同情。

"中国尽可以对社会主义闭门不纳，而不能不因偏离进步主流而承担风险。"[②]在西方资本主义内部，资产阶级已经与封建主义势力达成妥协或同盟以共同对付劳动阶级，劳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社会主义运动此起彼伏，西方大国的国内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在此情形下，"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③]

其四，社会主义符合人类共同传统，中国传统中也有着相似追求。

比如将社会主义看作类似于"孔夫子的大同，基督教的天国，佛家的极乐净土"。[④] 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把大同和天下为公作为理想追求，并且强调"民为邦本"等思想，《礼记·礼运篇》中有著名的描写"天下为公"和"大同"话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等。孙中山在对三民主义的阐述中常常从仁义、公理、济弱扶倾、均等、天下为公、民本等中国大同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

## 第二节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思想

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中国人的思想，不是指马克思主义只是被中国

①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② 江亢虎《洪水集》第44页。参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④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人所认识，而是指中国人内心接受、正确把握、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要产生一批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而且存在有别于早期出现的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

##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诞生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诞生是否具有偶然性？还是必然产生的？是从什么人转变而来的？需要弄清一些基本问题。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标准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一个思想标准，也就是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原理，这就首先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其他思潮的界限，其中包括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界限。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认识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者区别于其他主义思潮的地方，主要在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等理论。

### （二）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产生的

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产生的，也即是说他们都是些什么身份的人？又是从哪里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知渠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一批曾经拥护辛亥革命和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其信仰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其二，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呈现新一代出国留学（包括勤工俭学）热，目的是寻求十月革命的真谛，因当时北洋政府对苏俄影响的恐惧和阻挠，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直接去俄国的途径不畅，于是他们分别到日本、欧洲（主要是法国）留学，目的是了解学习苏俄，后来条件允许后一批青年则直接去苏俄学习。

其三，一些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志士，虽然没有出

国留学，但在思想上先后历经对传统文化感到失落、对西方欧美资本主义逻辑感到失望之后，从俄国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发现了救国真理，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的历史背景

这个时期从清朝灭亡到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是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动荡频发期，其间包括：1911 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长期统治；1914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危机；1917 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1915 年中国思想界掀起新文化运动，对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第一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大批判、大反省；1919 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及其帝国主义强权逻辑第一次进行公开质疑和反抗。

（四）基本文献和历史考证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历程可以通过其早期言论、文字著述等文献进行研究，他们之前的身份等问题则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例证。

例证一：一批曾经拥护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信仰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在 1911 年辛亥革命之际，热烈地向往资产阶级共和国。1913 年东渡日本留学，既接触到民主主义思想，也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1917 年写《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已经提到社会主义概念："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李大钊文集》第 485 页）辛亥革命最后失败的教训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反差，引发中国知识分子中先知先觉者新的选择思考，李大钊潜心研究俄国革命，于 1918 年 7 月在《言治》季刊发表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被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俄国革命的最早议论。文中将 18 世纪末的法国革命看作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兼合社会的革

命”，将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看作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兼着世界的革命”。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时代的新潮流。之后又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重要文章，提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等著名论断。李大钊于1918年底创办《每周评论》，组织“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开始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以科学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被誉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5月李大钊负责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辑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在其中发表自己写的非常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从“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阐释，这篇文章也被看作中国人的第一篇系统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等基础理论的作品，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1921年3月20日，李大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章，从分析中国在国际资本主义环境中所处的不利地位着眼，阐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看法。

陈独秀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主要吸收的是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1915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主要介绍西方文化思潮，掀起了一场著名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此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大清楚，将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1919年12月《新青年》上发表《本志宣言》，开始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实质，开始将关注从欧美转向苏俄。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声明“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①]，表明陈独秀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之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影响和带动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页。

另外，孙中山的一些老同盟会会员中也有人转变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失望之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进一步认清过去旧革命道路的问题所在，即照着欧美式议会政治很难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其中林伯渠又影响了其堂兄林修梅，林修梅的部下有彭德怀、贺龙等名将。1921 年林伯渠安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会晤，1922 年安排孙中山与李大钊、陈独秀几次商议，有力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例证二：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呈现新一代出国留学（包括勤工俭学）热，他们分别到日本、欧洲（主要是法国）留学，或直接去苏俄学习，从而成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时期留学日本并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是：杨匏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他们在介绍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杨匏安被誉为南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者，1919 年 11 月至 12 月发表译述文章《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差不多同时。李达 1920 年 11 月在上海创办《共产党》月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持和领导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即人民出版社，系统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1920 年 12 月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和《马克思还原》等文章。李汉俊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的理论家，1920 年 8 月为《劳动界》报写了发刊词，他翻译介绍《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并帮助陈望道校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协助李达翻译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

这个时期留法并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有：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向警予、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欧洲亲身感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斗争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中努力探求拯救中国

之道。

直接到苏俄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知识分子中，最先去的是瞿秋白，1920 年 10 月瞿秋白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辗转出发，于 1921 年 1 月到达莫斯科。他有机会多次聆听列宁的演说。在他之后，罗亦农、彭述之、何今亮（汪寿华）、萧劲光、刘少奇、任弼时等数批青年前去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例证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一直留在国内边坚持斗争边探索救亡之道，在对旧中国文化和西方欧美思想进行反省的过程中，在对各种主义之争有了清醒的比较认识之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俄国十月革命所昭示的道路，成为中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在 1949 年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一个过程的。"并且说："学习毛泽东。必须是全面的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我们提出学习毛泽东，要使青年越学越深，越学越有兴趣，更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整个的思想体系。"首先，从毛泽东成长的早期历史环境看，中国经历过 1894 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8 年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农民义和团爱国运动（1898—1904），1911 年辛亥革命，1919 年五四运动等。从毛泽东的读书背景看，少年接受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喜欢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但对书中全是统治者而不见耕田农民的状况感到不满。后接触到新知识，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接受的是封建改良思想。1911 年到长沙读中学，看到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民立报》，开始接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并写了第一篇政见文章（贴在学校墙上），提出要孙中山从日本回来任新政府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从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认识中还将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混在一起。辛亥革命前夕即剪掉自己的头发辫子。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成为革命新军

士兵，但看到辛亥革命果实很快被旧军阀官僚抢走之后，大失所望，退出新军，继续读书和探索。1913 年春至 1918 年夏，考入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并毕业。这是一个思想斗争和转变的时期，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斯诺：《西行漫记》，第 125 页。)

新文化运动之前，毛泽东读书范围有中国思想家的著作，如王船山、顾炎武、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也有西方思想家如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达尔文等人的著作。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是《新青年》这一新文化运动阵地的热心读者，从中接受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对旧专制、迷信愚昧、旧礼教、旧文学、旧文言文、封建旧思想等有了更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始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赞赏有加，彻底抛弃了康、梁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是辩证的，对中西文化都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不像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比如，胡适、陈独秀都有这种倾向，认为中国文化绝对的坏，西方文化绝对的好。新文化运动期间，毛泽东有了改造社会的认识，但依然停留于改造思想的水平上，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心"，还没有认识到更为深刻的经济、政治因素。1917 年底至 1918 年发起并成立新民学会，学会章程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以及规定"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为守则。毛泽东寻求真理的决心是："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917 年 8 月 23 日给黎锦熙的信)

1918 年 8 月，毛泽东为了筹组新民学会会员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进北京，并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北京大学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学术活跃，新旧思想斗争激烈，在此期间，至五四运动前，毛泽东既

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思想，也接触到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如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毛泽东回忆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斯诺：《西行漫记》，第128页。）此间，毛泽东还起草过建设新村的计划，就是要把学校、家庭、社会合为一体，通过人人平等、互助等新社会生活方式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五四运动作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毛泽东也在五四运动中成长为一个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于五四运动后不久创办了宣传革命思想的《湘江评论》，开始对十月革命的进步潮流有了深刻认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动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当时有不少人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民众联合的力量有了深刻认识（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但此时，毛泽东还留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能够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有限，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暴力革命理论还缺乏认识。

直到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到北京、上海继续探寻改造社会和中国的出路，读到《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等书籍，对各种主义思想进行比较，同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进行多次交谈、讨论，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

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①]，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②]1921年1月1日、2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毛泽东就在长沙等地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创办书社，介绍新书，并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斗争。除此之外，毛泽东非常注重深入工人、农民之中，同劳动者打成一片，办夜校，启发他们学习，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传播。

##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条件

### （一）影响中国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两大实践运动

#### 1. 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信仰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20世纪开天辟地的政治事件，对整个世界范围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产生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因为它创造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新领导力量，并且创造了新的革命道路和新方向。

十月革命在中国革命者认识上具有颠覆性影响的因素之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成功领导了革命，成功领导组建了新性质的政权，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回顾之前，世界上反抗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专利，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基本上是统治者领导的。在中国晚清王朝，面对清王朝的昏庸无能，虽然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王朝政权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但这种农民起义的阶

---

① 关于是夏天还是秋天学界有一定争议。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级局限性是很显然的，它依然信奉的是旧封建思想，也必然以失败告终。清末也出现过贵族官僚、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先后发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但主要是以封建主义来挽救封建统治，也必然一一失败。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这种形式上照搬欧洲的民主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合适的现实基础，其领导阶级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软弱，革命明显呈现出不彻底性，既没有根本触动封建统治的土地制度等经济基础，也没有触动旧军阀统治等政治基础，更没有触动旧意识形态等文化基础，甚至还对西方帝国主义外部列强势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屡屡失败之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号角，似乎一下子唤醒了中国人，不仅使一些资产阶级革命者摒弃从前，转投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革命，而且更加鼓舞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给予他们新的希望、新的憧憬、新的斗争方向。

十月革命在中国革命者认识上具有颠覆性影响的因素之二：苏俄外交政策与帝国主义迥然不同，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的本质被彻底认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幻想被现实所打破。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体系下的民族解放的理论，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体系下，必须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倡导建立独立自主、平等、人道的民族关系准则，他将马克思主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一论断运用于新生的苏俄政权的对外政策制定中，指出：“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①]列宁强调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声明放弃或取消俄国之前在中国的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这些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1 页。

赢得了中国革命人民的欢迎和尊重，也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得以深入人心。

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与中间阶层问题》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同志的名字，现在成了殖民地国家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里受压抑受摧残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最爱戴的名字，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说以前，在极辽阔的罗马帝国内，基督教被认为是受压迫受摧残的奴隶的救星，那么现在的情形是：在帝国主义的极其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已经开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①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2.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信仰

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③

五四运动对中国人认识产生颠覆性影响之一：新文化运动从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阵营分裂。

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虽然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并且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但五四运动崇尚的还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希冀以理性和反封建的文化变革来拯救中国，但封建王朝覆灭后的封建复辟和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利益的惨痛教训，让中国革命的志士

① 《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99 页。

认识到，单纯的文化革命和欧美社会模式难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改变现有的经济基础，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是说，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造中国才是根本出路。于是，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新文化运动中的干将开始出现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毅然抛弃旧的世界观，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传播。

五四运动对中国人认识产生颠覆性影响之二：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一起登上政治舞台，使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阶级的力量。

五四运动之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看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力量，也不敢发动工人农民。五四运动以学生运动开始，以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参与革命斗争胜利收场，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让革命者看到了自己的阶级力量，先进的志士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广泛传播，而且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相结合起来，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经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派，才是救国之道。

### （二）思想交锋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

任何一种理论进入人们的思想或被人接受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至少要经过新旧思想的交锋、争斗，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思想并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最后成为许多人信仰的主义，更不是简单的事，不仅在接受者的内心经历过比较和取舍，而且在接受者与拒斥者之间经历过激烈交锋。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多种思潮之一进入中国的，也必然处在多种思潮的激烈交锋之中，经历过真理越辩越明的阶段。

新文化运动期间，大量西方思潮进入中国知识界，其中影响较大的

是进化论、实验主义、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五四运动期间又有大量的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来，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都作为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在此情形下，人们受到这样那样思想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主义之争也就很容易爆发。马克思主义也被反动势力攻击和污蔑为“过激主义”、“洪水猛兽”、“异端学说”。将问题与主义对立的言论也甚嚣尘上，也有人醉心于超阶级的纯学术，将学理与主义对立起来，等等。

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进行了三次思想论战，分别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建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等进行了思想论战，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加以反击和批判。应该说，当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主张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对于还不十分成熟、不具有斗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胡适不仅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来反对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而且邀请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来中国讲学，扩大其影响。张东荪也邀请基尔特社会主义倡导者罗素来中国讲学，无政府主义者摆出最革命的样子，叫嚣个人万能、绝对自由、最彻底的革命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这个阶段思想交锋和论战，一方面澄清了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教育人们要科学对待理论，理论必须联系中国实际，实际工作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打下初步基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文献及观点（尤其是已经产生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要与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观点）例证参考：

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积极参与问题与主义之辩。

同年8月，他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

陈独秀1919年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提出：“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②

张太雷1921年在“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中提出，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③

恽代英1921年在“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中提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④恽代英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23年10月创刊），经常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抨击当时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李达1921年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提出：“中国社会革命党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⑤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办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发表文章，非常强调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1、432、433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5页。

③ 《张太雷文集（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④ 《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0页。

⑤ 《新青年》9（2），1921年6月1日。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第2集)，"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第3集)。1921年1月21日复信在法国的蔡和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①

当然，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交锋和论战在之后还将不断爆发，其中20世纪30年代联系中国社会性质和道路抉择的大论战，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发展作了理论铺垫。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依靠工农联盟并联合各革命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断得到深入扩展，不仅进入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得以在革命实践中结出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此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断深入中国人的思想。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

### 一、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同时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进入了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新阶段。

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得以传播的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马

①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克思主义开始具有被中国人所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有利条件。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还并非全国的执政党,只是在自己的根据地或所到之处发挥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共处的环境并不十分有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在经历了艰苦斗争条件下真理在人们头脑中、在社会上越辩越明的曲折,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正确主张、政策的正确性和实践的不断胜利等所提供的反复证明之后,才得以不断扩展影响并逐渐深入人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本身就是一次更有力的现实证明,在中国人民为这一胜利欢欣鼓舞之时,也就普遍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尽管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学过、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明显处于十分有利的条件之下。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成为新中国建设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全国解放范围的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分布到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策和策略,都在让每一个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感同身受、逐步深化。这就是毛泽东所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②]

## 二、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教育普及

首先,学习、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顺理成章。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主人的新型政权的国家，她是马克思主义胜利的象征，所依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建国原则，广大人民群众必然有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愿望。马列主义原理及其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必须让全国人民所普遍理解和掌握，才能在建设实践中加以贯彻运用。在此情况下，全党全国上下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全国上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努力。建国前，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就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宣传教育，《矛盾论》、《实践论》就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知识语言、从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诠释，两论对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建国以后，毛泽东非常关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工作，亲自帮助选编教材，动员理论家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通俗读物，比如，1951 年 3 月 17 日致函李达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①1954 年 12 月 28 日又致信李达："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②毛泽东还推荐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等适合大众和青年人阅读的书籍。

第三，教育普及的形式和渠道多种多样。党校是党培养教育干部的专门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的重要场所。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党校教育，建国后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党校，党校轮训成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07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87 页。

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普及的重要途径。全日制大中小学也是新中国贯彻思想教育的主渠道，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并通过教材和教学方法体现出来。学习运动也是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普及的重要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也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响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发表建议，对民主党派成员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觉悟、改造观念的类似要求。这种学习也往往结合学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比如，1953 年在全国开展大规模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热潮。当然，学习运动也与政治斗争、与个人崇拜发生过联系。

第四，大量出版发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读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普及。解放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在解放区之外被禁止出版，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实际需要，整理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宣传介绍读本的工作就提上议事日程。1949 年至 1956 年期间，主要是整理重印了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等。1956 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 1974 年共出版了 39 卷，“文革”结束后又出版 11 卷)。1955 年开始出版发行《列宁全集》(到 1963 年出齐了 39 卷)。1960 年出版《列宁选集》四卷本(1972 年再版)。1953 年开始出版《斯大林全集》(到 1956 年共出版 13 卷)。1951 年开始出版《毛泽东选集》(到 1953 年共出版 1—3 卷，1960 年出版第 4 卷)。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普及，同时反映出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服，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服，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信服。

# 第二章
#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进入人们的思想，在思想领域必然引发相应的化学变化，事实表明，这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结果是中国人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革，起初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然后发生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上，后来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身上。这种变革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

## 第一节　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变革的重要节点

### 一、旧传统观念和思维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般说，具有数千年文明文字史的中华民族，必然具有独特的观念系统和思维系统，而且长期相似的统治机构也会塑造出长期相对稳固的观念形态。从查找问题的视角，简要说来，至少有以下方面问题表现：

第一，天命论思维。人们熟知的说法："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造成一种抗争无益和悲观主义的心态，事实上王朝的覆灭与兴起虽然不断地改朝换代，但其形态依然是循环交替，这就更加印证了天命论逻辑。

第二，忠君思想。天命观也是帝王权力合法化的思想基础，唯有皇帝与天保持直接关系，依天命统治地上民众，皇帝也被称作天子。古代文化讲究忠孝仁义，忠字排头，以忠君为先，帝王不仅拥有王权，而且拥有人心，所以可以主宰一切，人们熟知的说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下莫非王臣。"国家是帝王的国家，人民是帝王的臣民。虽然偶有强调"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观，但这里的民就像滋生粮食的土壤一样，只是被动的、可被利用之物，并非像帝王一样高高在上。

第三，等级观念。等级观念是由长期的等级秩序塑造起来的。封建礼教奉行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迫使人们各就各位、各遵各德、各认各命，抗争既是成本巨大和徒劳的，也是违背常理的。

第四，英雄史观。人们熟知的说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似乎历史总是由少数人、个别人所创造，统治者一方面打造社会普遍倡导的英雄主义和官本位，一方面搞愚民政策。在此观念系统下，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也自认命贱，普遍养成了奴性心理。

第五，唯圣、唯经。现在人们知道这是一种思想禁锢。崇拜过往圣人、遵循圣典，不能离经叛道，人们熟知的说法："循规蹈矩"。人们知道最重要的是遵循已有的许许多多的规矩，而不是什么创新和越轨。这就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复古、仿古和拒斥变革的思想因素。

第六，鄙视夷狄。人们熟知的说法："华夷之辨"，"叩头"等。中国被认作世界的中心，统治者长期夜郎自大，有天下观，没有主权平等概念，也没有外交、对外贸易、国际法等概念。

第七，重文治、德化、消极抵抗的和平主义。许多问题总是从道德上查找原因、进行解释。人们熟知的说法："以理服人"、"礼遇天下"。中国自汉朝以后就重文治、轻武功，强调教化、守信，而不是武力征服，武只是

辅助手段。所以，在遇到外敌侵扰时，更多的是“先礼后兵”、“闭关”等。

列举上述方面，是为了对照接下来的历次冲击中每次分别在那些方面发生变革，以及变革的先后顺序。

## 二、三次冲击和变革尝试

（一）晚清帝制的衰落和西方列强的外部冲击，也会冲击旧中国传统观念形态，于是发生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一幕幕变化，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被动了解适应西洋规则，认识帝国之外的崭新世界。这应该是第一次冲击。

19世纪40年代清王朝还是“闭关”心态，之后便开始学着遵守洋人的条约和重视洋人的国际法则，可谓处于“守信”心态。最为重要的变化是逐步放弃了中国中心主义，国人知道了中国不是世界中心，世界也不是天圆地方。以前的所谓“夷务”改成了“洋务”，当然最后变成外交事务。尽管如此，旧王朝的精英们效忠的依然是旧的王权，“中兴”的是旧王朝，依然陶醉于旧传统思想，对“外夷”思想不屑一顾，他们提出的应对危机之策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托古改制”，对外依然坚守“相仁之道”、“天下一家”等，希冀以旧的“仁道”来战胜西方列强的霸道。此间以太平天国为旗帜的农民暴动，要摧毁的是旧王朝，要建立的依然是“天朝上国”，虽然强调民族尊严和国家地位平等，但依然坚守“万方来朝”、“四夷宾服”观念，依然将外部势力看作可以鄙视的夷狄。当然，在晚清遭遇一次次不幸之后，偶尔出现一些开放型人物像郑观应、王韬、郭嵩焘等人，他们也有过“西化”、抛弃华夷之辩等零星的异类观点。总之，日益衰落的清王朝依然持有的保守心态，必然导致其最后的灭亡，但随着它的灭亡，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观念也与整个中华文化一样陷入一场严重危机。

（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在推翻了清王朝的同时，也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思潮，对悲观失落的中国人

和日渐衰落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这第二次大的冲击开始让中国人从过去看不起洋人到产生崇洋媚外的心态变化。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举的是向西方学来的民族主义旗帜，清朝灭亡后，西方文化可谓大肆涌入中国，西方教会学校和传教士数量剧增，虽然出现了捍卫国学的“国粹派”和以孔教立国的“新保守派”，但都难以抵挡声音更大的“新文化派”，新文化派高高举起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大旗，发起了一场要对中国进行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在此运动中，西方的各种思潮包括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等都找到了自己的舞台，甚至滋生出全盘西化和崇洋媚外的洋奴心态。

以孙中山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思想来说，他的民族主义观已经包含这些方面：“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使整个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①]“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②]等。

在经历失败挫折后，孙中山将目光转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经验上，受社会主义和列宁思想的影响，他进一步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以俄为师、依靠人民、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经济赶超、开放主义等一系列先进思想，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可惜他的思想因他的早逝而没能贯彻下去，而且，他的超阶级的“王道”、“霸道”、“公理”概念依然是抽象的和平主义空想，具有浓厚的旧传统文化色彩。正如他自己在《民族主义》第六讲时所说：“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分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③]虽然提及四万万全中国人，但事实上依然在精英圈里进行动员，难以触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神经。有限的革命只能获得有限的力量支持，难以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

① 《孙中山文萃》下卷，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98 页。
② 《孙中山文萃》下卷，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67 页。
③ 《孙中山文萃》下卷，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07 页。

另外，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西方的其他恶劣思潮侵染中国社会，比如散布民族对立、压制民主自由、崇尚国家至上、策动战争和种族屠杀的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战国策论，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其影响加重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而当时的知识界的人士普遍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他们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①。

（三）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失败告终，苏俄十月革命带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曙光，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工农武装割据日益声势浩大，最后势不可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所到之处，红色文化深入人心，这对中国人的心灵冲击更加猛烈，受众面更大，这第三次冲击所带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则更具根本性。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中，不仅横扫了中国几千年旧社会的旧思想、旧观念、旧思维，而且战胜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其他落后思想观念，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澄清了许多以前令人困惑的大是大非问题，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认清了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所处的社会性质，找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为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开辟和胜利发展提供了正确的认识指导。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革命性影响

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西方外部势力的强势冲击之下，晚清的

---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改良思想和辛亥革命后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虽然反映了中国人的觉醒意识，但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无法让中国革命者看清中国方方面面危机的根源，即使革命目标已经明确，也无法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看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所以一再失败。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找到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首先在于他们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产生了彻底的革新，这种变革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劳动者创造财富。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思想，使中国广大革命群众彻底破除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道理，知道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应该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应该受到尊重。从此，劳动人民一改旧社会的奴婢心态和等级观念，产生了高昂的革命斗智和反抗精神，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生力军。特别是经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失败之后，马列主义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仅靠知识精英或有产阶级也是无力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党在认识上逐步成熟起来，工人阶级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工农武装割据再也不是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他们更新了观念，有了新思想、新追求、新作风、新纪律、新风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当家做了新社会的主人，并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知识系统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历史观的革新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看待中国历史并用于改造中国旧史学，于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该书是最早用马

克思主义观点写出的史学论著。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正是这次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发展，也涌现出了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何干之等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形成。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书籍明显增多，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出版了一批中国通史和中国思想史著作，比如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翦伯赞著《中国史纲》，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侯外庐等人合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何干之著《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现代革命史》，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邓初民著《中国社会史教程》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时中国最早最有成就的社会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促使中国思想界革命的成果。新史学又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推动了中国人的观念变革。

##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变革或文化教育改造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对于中国危机的根源认识并不清楚，先是觉得武力不如人，后又认识到朝廷昏庸腐败，再后来从文化上找原因，认为必须进行文化改造，改造国民性，有人主张教育救国。包括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以及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都曾寄望于文化改造和国民教育。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给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不仅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而且让人们的思维方式获得了变革。辩

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原理告诉人们，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人类社会领域，从根本上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后者对前者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巨大的。这就要求人们在看待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于意识领域，要到现实生活中探究问题。文化领域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政治领域的问题有深刻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源，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内在规定。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变革现存的生产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从而创造极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于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开始看清了政治危机、文化危机背后深层的生产方式根源，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有了新的目标追求和切实可行的实现途径，坚定了一往无前的革命决心，在经历重重困难和曲折之后，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道路。

在知识系统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求解革命道路，但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而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陈独秀在内的不少人也犯过严重错误，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和理论论战，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争论中这种斗争表现得异常尖锐。国民党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恶意破坏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反思，不仅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道路、方式重新加以界定，而且要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再确定，那么如何确定？依据什么确定？以及马列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分析？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派别从自身利益出发纷纷提出各自的观点和论证，从而在思想战线爆发了一场与武装斗争同时进行的大论战。参加论战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他们联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状况从各种角度论证唯物史观的合理性。郭沫若从甲骨文、金文的大量研究中发掘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一书，吕振羽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张闻天写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现阶段——任曙、严灵峰先生的理论批判》文章等。通过论战，革命人民进一步擦亮了眼睛，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进一步认定了马列主义对中国的指导意义，认识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质以及党内"左"倾和右倾路线的危害性，这些是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重要思想资源。

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袖人物，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不畏挫折，深入社会基层，一边作大量的社会调查，一边积极发动群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活学活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力量、革命道路的一系列科学的完整理论。毛泽东先后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调查文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也形成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1938 年 8 月，艾思奇、吴黎平合著《唯物史观》一书，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的人民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重要教材。

在新民主主义胜利之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面临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改造的紧迫形势，也肩负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历史使命。解决好这两大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人们急于发展生产，甚至搞过大跃进，为了解放生产力采取过激进的生产关系变革。人们也急于清除落后思想，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取得过明显成效，也坚持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邓小平在后来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概念来说明上述问题。1983 年 4 月 29 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论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问题："在社

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①]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物质文明的成就举世瞩目，但精神文明有成绩也有教训。如何促成二者协调发展，仍然是个富有挑战性的迫切任务。

总之，关于唯物史观对中国人的认识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在实践上对中国社会文化带来的深远变革，以及如何才能更科学地理解唯物史观和更好地贯彻于实践，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梳理。

## 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句话现在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官方话语和行为准则，而且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常识性守则，它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原理，又经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转化为中国人的话语，变成通俗易懂又非常实用的道理，最基本的就是人们熟知的几对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和行动准则。

但是，这种当今人们熟知的看似浅显的大道理的得来并非顺畅，首先因为过去几千年的帝王统治靠的是愚民政策，中国人长期形成了的思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维定式就是，一方面遵古训、奉道统、讲名分、守规矩，另一方面靠传经验、重模仿、怕冒险，一切听天由命，这样就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结构，即使改朝换代不断，这些也基本不变，也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近代外来势力入侵打击了清王朝，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外部思潮进入中国人的头脑，这样中国的“天”发生了巨变，中国的“道统”也发生了裂变，经历新旧交替的中国人开始有意无意地进行着选择。其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革命历程中也经受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煎熬，即使党的领袖人物也有人犯过惟上惟书的教条主义错误，有人犯过愚昧无知的经验主义错误，都给革命事业造成过重大损失，给人们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危害或不良影响。正是在一次次挫折和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才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最后经历实践反复检验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密切结合起来。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就会变得愚昧无知、鼠目寸光，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撇开具体实际照本宣科就容易流于空谈，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贻误战机，导致失败，误国误民。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正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典范，所以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也正是在经历曲折之后这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让人们从认同到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道理，对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道理的深刻性有了高度的认识。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坚持的还是这些道理，只要坚持做到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背离这些道理就要受到失败的教训，过去、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

在知识系统上，需要了解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都有过挫折、失败之后的教训总结和理论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发表了见解、作出了贡献。当然，最为突出的文献贡献在于几个大的时期。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针对党内“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照抄照搬马列书本

上的条条和共产国际指示，不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导致中国革命失败和严重挫折的情况，毛泽东 1930 年 5 月专门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主张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深入社会底层，带头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受他的影响，社会调查成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1936 年在陕北延安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为了从思想上进一步清除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 年写了《辩证唯物论提纲》，并亲自讲授其基本道理，后来出版了《矛盾论》、《实践论》。1938 年，毛泽东联系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形势发表了《论持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学会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实际环境。1942 年 6 月，毛泽东又为党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决定。1945 年中国共产党新党章明确规定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正如 1983 年邓小平所总结：“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习苏联的经验，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挫折和教训，1955 年中国领导人开始注重探索自己的道路，从中国实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 页。

际出发，1956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重新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但好的主张终因极"左"路线的影响而没能够很好地贯彻下去，以至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全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着重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重新确定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新确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这个时期，理论界掀起了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学习研究高潮，并联系实际创作了许多学术著作，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理论支持。

最后一个时期就是当前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国家知识、经验和模式，在国际化、商品化、信息化带来思想观念巨大变化的同时，难免出现两种不良倾向，一是照抄照搬西方的倾向，一是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倾向。于是，党中央针对这两种倾向，提出过要注意反对两个教条主义倾向，既要反对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针对具体情况作的个别结论的倾向，又要反对拿西方理论观点和做法来套用中国的倾向。过去反对照搬苏联模式，现在也反对照搬西方模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非常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学习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进行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的集体学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 第三章
# 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 第一节　阶级自觉与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

### 一、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受俄国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完成自身世界观转变之后，特别是与无政府主义分子划清界限之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迅速找到了自己的阶级队伍，即工人群众，积极深入到他们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先进分子，将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工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密切结合，为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条件。这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首先实现了自身的身份和角色的蜕变，即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属于无产阶级的队伍即恩格斯所说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1]。在中国，他们先于“体力劳动的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7页。

人兄弟”觉醒和成熟，并于1921年上半年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具体情况，有个何时成立的时间问题，现在我们把1921年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但实际的成立日应该更早些。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时间是1921年6月10日，而且他报告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还要早些，而且谈到党成立的直接动机是将无政府主义分子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中清除出去。他在1921年6月10日的文中有以下几段表述与考证党的成立相关：

“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是一九二零年五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许多小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共事，但是在这些共同组织中我们有自己的同志进行监督和领导，我们曾作过努力，要使这些组织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然而后来我们确信，要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一起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已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扬他们自己的宗旨和原则，而他们的宗旨和原则则与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相矛盾。”

“为了阐明我们的宗旨、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关于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也表明了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①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534页。

“截至今年五月一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1]

“我们还出版了一些杂志，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青年的杂志《曙光》、《新青年》以及日报《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还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2]

“中国共产党还把《苏维埃俄国》、布哈林的《共产党纲领》以及一套《社会主义者袖珍丛书》译成了中文。”[3]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夸大个人在无产阶级群众斗争中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在我们队伍中还有卓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好处，党必须利用这一点，以争取共产主义思想在我们这个远东最大国家的领土上获得胜利。”[4]

以上几段表述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出现，特别是提到在 5 月 1 日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地方党组织了。

## 二、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曲折历程和历史局限

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自然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所面对的最直接问题是如何看待时局，如何作为，如何组织领导工人阶级，进而如何领导革命运动。认识上还显得稚嫩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了从照搬理论——照搬俄国——吸取教训——勇于探索——寻求出路的曲折历程。

阶段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即仿照欧洲开展组织领导工人的斗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34 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34 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34 页。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35—636 页。

争运动，但并不顺利，其经验教训是：1.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起来，这种反动势力的力量大大超过工人阶级的力量。2. 与欧洲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不同，中国封建军阀实行的是法西斯专制，因此，中国还不具备欧洲和平罢工的条件，不能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

历史背景：中国早期的产业工人产生于19世纪晚清末期，分布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洋行、企业，晚清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地主、买办、商人等投资工业创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这些行业受制于封建制度约束发展缓慢，产业工人数也不足10万人。20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加紧掠夺竞争和辛亥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的兴起，扫除了部分封建障碍，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之间相互厮杀，使得中国的工商业企业有较大发展，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数量快速增长到200多万人，集中分布于沿海和水陆沿线的大城市，相对集中也易于动员。

党在此阶段对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认识和政策、举措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党的主要精力是组织工人，建立产业工会，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制定了与中国以往其他政党派别不同的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第一项就是关于工人组织的决议："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①]

其二，鉴于中国产业工人普遍文化底、文盲多的状况，中国共产党通过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人中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开办补习学校（夜校）、组织工会等形式，让工人边学文化，边学理论，边参加斗争实践，边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提高觉悟,使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为一个领导阶级,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灵魂和指路明灯。

其三,组织、领导、发动工人运动,开展斗争,迅速掀起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从 1922 年 1 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到 1923 年 2 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年左右时间内发起大小罢工 100 多次,工人参加人数达 30 多万。然而,京汉铁路罢工中,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被屠杀牺牲的烈士 50 多人,被捕 100 多人,受伤 500 多人。第一次全国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次深刻反思。

阶段二:第一次全国工人大罢工浪潮过后,全国各地军阀肆无忌惮地对工人运动实行镇压,工人运动转为低潮,这使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认识到,力量薄弱的工人阶级孤军奋战还难以战胜势力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的反对统治者,中国还不具备和平斗争的政治环境。于是,开始寻求新的斗争方式和可以联合的革命力量。

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认识和判断: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国民党,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赖外力,减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因此,中国国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8 页。

民党不但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①]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及专注军事两个旧观念，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中国共产党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分析判断：“因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②]

党在思想认识上的隐患：第一次全国范围工人大罢工失败后，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内部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陈独秀从重视无产阶级转向重视资产阶级，由二大前拒绝国共合作到国共合作后依赖国民党、轻视工人阶级的转变，在联合战线和革命领导权上表现软弱奉迎，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后续不利埋下隐患。1923 年 12 月 1 日，陈独秀在《前锋》上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阐发了一系列右倾观点。比如他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分析，其主要观点为：

“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幼稚的，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

“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

“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要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具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

---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6—277 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9 页。

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斗争，没有重大的意义。”

“工人阶级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争斗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争斗的战线，躲到经济争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种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①

与此同时，邓中夏、毛泽东等人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驳斥。

邓中夏在1923年10月15日、12月26日《中国青年》上分别发表“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指出“我们对于中国的工人运动，应是极抱乐观，认为工人群众终归是中国革命运动最伟大的一种势力”②。1924年11月在《中国工人》上发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与陈独秀的观点针锋相对：

“怀疑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不外两点理论，兹分别指出及纠正于下：（一）从数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幼稚，他们并没有举出实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368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9页。

际的数目，仅持一种形式的理论说：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这种理论用之于产业先进国是对的，用之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就似是而非了。何以呢？因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有本国的和外国的之分……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滋长的，那么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是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在客观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看上面第二段所列举工人的总数目便可见得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二）从质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其理论是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心理，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还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有国家觉悟的是少数；有阶级觉悟的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种理论近乎说哲学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以心理来解释社会现象，今姑且退一步假定心理是可以解释的，然而亦应有平时心理和战时心理之分……我们考查工人心理最好是把罢工条件来做根据。"[①]邓中夏在这里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虽然平时心理中都有家族、亲属、神权等旧观念存在，但一到革命斗争运动中，资产阶级镇压、残杀工人阶级的战时意识与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一样显露无遗。

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邓中夏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其理由如下：（一）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二）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们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185页。

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①]

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力量和局势发展作了正确分析判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而无产阶级才是最革命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更因力量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而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在开篇提出著名论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结尾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②]

历史和理论背景条件：1. 理论上，列宁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而不是融合)，同时要保持自己运动的独立性。[③] 2. 现实政治中，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历经多次失败后，看到了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业。但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更不愿意看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3. 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在两者之间加以撮合，在促成国共合作上进行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187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2—607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斡旋。

该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政策主张和对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提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须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①]决议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是联合与援助，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必须保持阶级独立性。这就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了铺垫。

1923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解决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了国共合作后如何开展工人运动、掀起革命新高潮的问题，为同年爆发的上海五卅运动、广东省港大罢工等反帝爱国运动作了政策铺垫。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严密组织下，上海工人进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直到取得胜利，占领了除租界之外的上海市区，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创建了与资产阶级国民政府有着原则性区别的上海市临时政府。只是这一临时政府没有来得及巩固就在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者的屠刀下陷入失败。

国共合作后工人运动取得成效的经验：1. 中国共产党将阶级斗争

---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与民族斗争结合在一起，高举反帝爱国旗帜，与民主资产阶级建立起统一战线。2. 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无法实现对整个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但已经实现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从而保证了工人运动的正确性和彻底性。

阶段三：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也是国民革命的失败，革命形势转向低潮，工人运动转向低潮。一方面，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举起屠刀对工人纠察队进行屠杀，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叛变，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残暴屠杀令，残酷镇压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到1928年，全国有10多万工人被杀害，原来工会组织290万工人剩下不到3万人。另一方面，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由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和路线转到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王明的教条主义等“左”倾思想和路线，继续将中心放在大城市，强调以攻打城市、夺取城市、工人城市暴动为中心，给党和工人群众造成很大牺牲，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损失。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迈出了至少两个关键性步子：一是坚定地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革命斗争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出发，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及时总结教训，科学分析形势，果断放弃攻打中心城市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创建农村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取得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广大农民的支持，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 第二节　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内并没有很快注意研究农民问题，

开始也不大注重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其原因一是主观认识还没有到位，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党被理解为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自然首先关注工人阶级。客观上，党成立后正值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之后的国共合作又掀起了北伐战争等大革命高潮，新成立的共产党力量和精力有限，还无暇顾及或专注农民问题。另外，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的意见影响，以及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看法的局限，都造成党内早期农民观念和农民运动政策的消极懈怠。随着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不断发难和大革命的曲折进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形成关于中国农民阶级的正确观点，使党逐渐转到关注对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上。

农民问题涉及的关键是：中国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即农民中也有无产阶级和其他不同阶级成分），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即有过中国农村是封建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争议），农民运动、乡村革命与中国革命道路等。

## 一、对待农民问题的不同看法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开始提及中国农民，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若大量的穷苦农民能和工人携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①]但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时的任务还不是发动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党的任务首先是引导无产阶级去帮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工人和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在第一步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胜利之后，第二步才是联合贫苦农民争取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民主革命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①]

中国共产党三大之后，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文章，认为："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敌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②]可以看出，虽然农民问题已经引起注意，但此时在对农民革命的认识上党的主要领导人依然持一种消极观点。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又总是把中国共产党看作在野党，将军权、政权拱手让予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会把农民从封建专制下解放出来。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思想更加脱离中国实际，逐渐沦为托派分子，甚至主张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不再需要进行民主革命，在党内制造思想混乱并引起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直至被开除出党。

1925 年 5 月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中明确提出"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说是天然的同盟者"。[③] 同时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制定《工农联合的决议案》中提出："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寻找他的同盟者。这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3 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8 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9 页。

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但同时又指出：“我们知道政治的中心总是在城市，因此斗争的中心，也是重在城市。所以工人阶级应该努力去领导农民来参加这个斗争。”[①]当时还提出了进行工农联合的三点要求，即工人回乡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宣传教育，工会与农会之间互派代表，工会援助农民的斗争等。

除了邓中夏较早深刻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之外，瞿秋白、刘少奇等也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较早关注并有过正确论述，彭湃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农运大王，但相比之下，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得最为深刻和最为全面。

## 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和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与一般人所作的理论把握和宏观结论不同，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和农村形势的认识是从深入农村实际的社会调查和农村阶级斗争实践开始的，正确的结论也是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农村斗争实际并经过独立分析得出的。1925 年 2 月至 8 月期间，毛泽东利用回韶山养病机会在自己家乡进行了农村调查，还创办了二十所农民夜校，秘密组织起二十个农民协会，建立了韶山党支部，组织领导当地农民开展斗争，从中了解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实情，切身感受到湖南农民所富有的战斗性。毛泽东后来回忆 1925 年他在湖南期间的情况时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修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63 页。

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①]

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和参加发动农民运动的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分别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述，论证了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农民是生产和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必须建立农民革命武装来推翻地主阶级政权等正确观点，反击了来自地主豪绅、封建军阀、资产阶级对农民运动所叫嚣的“糟得很”、“痞子运动”等攻击、污蔑，以及当时共产党内的右倾观点，毛泽东热情地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密切关系，即“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②]明确提出了解决农民政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等一系列正确的行动纲领。

1927 年 4 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农委作出关于农民运动的三项决议案，分别为政权问题决议案、武装问题决议案、协助社决议案，提出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农民不但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要求各省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解散一切地主阶级武装团体，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但在武昌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4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 页。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未能被大会采纳，甚至未予讨论。

国民党公然反共、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致使 1925—1927 年的大革命失败，1927 年中旬，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1927 年 7 月 20 日，中共中央、中央农民部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1927 年 8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①]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统称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着重提醒中央：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并提出著名的论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意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②]

有了上述的前期实践和认知，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之后，果断采取上山保存革命武装和开展农民游击战争的正确路线，为了引导红军和全党沿着正确的道路奋勇前进，毛泽东及时结合革命斗争形势，1928 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1929 年写了《红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前委致中央上的信》等，提出并阐述了红色政权即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理论。192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复信中央二月来信指出："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5 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6—207 页。

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1930 年 1 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并且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2]。这些思想理论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新式农民战争”理论，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 第三节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文化战线的斗争

### 一、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论战的外部思想背景

1927 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大革命失败，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数派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仍然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表现为，武装和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9 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93 页。

非武装的地主阶级掌握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封建残余以及军阀官僚上层建筑代替传统封建专制制度，成为中国国内压迫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还支配和控制着中国工业、财政、金融、交通等国民经济命脉。所以，中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结合”[①]。上述认识也是影响中共六大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判断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也有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如把蒋介石背叛革命等同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主张反对资产阶级的城市革命和反对富农的农村革命。这些在中共党内认识和策略上都产生了误导，也是造成了“左”倾盲动、冒进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问题上，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出现分裂，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少数人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托洛茨基从 1928 年 7 月到 1929 年夏，连续抛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等三篇文章，认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实现了资本主义化，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势力在中国的作用微乎其微，民主革命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从中国资产阶级的角度看，经过辛亥革命和这次大革命两次夺取，以蒋介石的上台为标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中国的统治权，民族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此时的“中国并无革命局势”，只有等到时机成熟，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们进而认为，既然中国农村已基本没有封建势力的存在，所以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并不是反对封建残余，而是反对资产阶级。

---

①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1954 年，第 261 页。

上述被称为“托派”的观点，从根本上误判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对中共在认识上也产生了不良影响，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和认识上的分裂，甚至为陈独秀等人否认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提供了理论借口。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再次确认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是，已被剥夺实际领导权的陈独秀等人在获悉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后，产生了思想共鸣，再次为其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从而挑起了党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分歧和立场对立，不仅引起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上的一场论战，而且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这场论战又继续扩展为思想理论界、学术界长达十年之久的更大范围的论战。

## 二、中国共产党内的认识分歧与论战

中共六大在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和革命形势，集中回答了当时困扰党内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两大根本问题。六大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被推翻，一切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①]。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②] 因此，现阶段中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7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4、409页。

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①]。大会还批判了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不断革命”论，指出中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同时指明了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

陈独秀等人继续坚持否认中国封建、半封建社会性质。其思想进一步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的政治纲领。“托陈取消派”的错误观点集中反映在陈独秀于1929年7—8月写给中共中央的三封信件中。其主要论点是：1927年蒋介石的叛变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只要实现关税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任务也就完成。在经济上，封建残余“受了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等待资本主义相当发达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只能“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因此应取消一切革命行动，而中央却“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遂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地位”[②]。

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等人不仅鼓吹“托派”的观点，制造党内思想混乱，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结合成立了反党组织，党中央不得不决定把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之后陈独秀等人继续散布其托派观点。[③]

面对“托陈取消派”对中共六大路线的公然发难和党内宗派活动，中

---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7页。

②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438页。

③ 陈独秀的托派相继发布了《告全体党员书》和由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陈独秀等人坚持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因此“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但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地主已资本家化”。陈独秀在其创办的托派组织机关报《无产者》上相继发表了《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等两篇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红军大部分是“土匪与溃兵”，预言“没有城市工人革命领导的所谓‘红军’”是注定要失败的。可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0月5日作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派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在中国"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一点也没完成,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一点也没有解除",国民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1],其政权并非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决议》重申了六大的主张,明确指出陈独秀等人错误的严重危害。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对于托洛茨基反对派"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2]。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开除陈独秀等人党籍的决议案。

## 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延伸和扩展

在中国共产党与"托陈取消派"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论战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和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也群起鼓噪,错误解读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旨在从思想理论上消解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陈独秀的"托陈取消派",与当时的新生命派、新月派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继续发起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立场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布尔什维克》、《新思潮》等为阵地,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取得反对"托陈取消派"政治斗争的胜利后,也迅速组织了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组织发动"左联"、"社联"等革命文化团体,通过《新思想》等杂志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宣传阵地,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有力批判,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进一步肃清了"托陈取消派"的思想影响,有力反击了国民党当局及反动文人的文化"围剿",捍卫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97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2页。

了中共六大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基本判断。[①]

这场论战不但在规模上从政治界扩展为一场思想理论界、学术界的更大的论战和思想争鸣，而且在内容上从中国社会性质延伸至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三大领域的更广范围。其中要害问题包括：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要不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秦汉之后中国是封建社会还是其他社会，人类社会有无共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等。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继续和纵向深入，各派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问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等展开激烈讨论。这场论战所具有的学术深度及其体现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对人们认识基本国情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弄清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持，进一步坚定了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②]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围绕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农村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等问题展开，通过论战进一步具体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抓住农村问题这一中国最大国情实际进行重点分析，为全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中国农村，将农村作为革命沃土，注重理论

---

① 当时实际负责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长篇文章，进一步阐释了党的六大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从理论上系统批驳了"托陈取消派"的错误。同年4月，《新思潮》第五期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集中发表了王昂（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吴亮平）等一批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具体深入地探讨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政治关系及其特点。

② 郭沫若于1930年1月在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中国国情特殊论"、"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谬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第一次把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几种社会经济形态有规律更替的历史。其基本观点得到吕振羽、翦伯赞、何干之、邓云特（邓拓）等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支持。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认识上，李达、郭沫若、何干之、吕振羽、侯外庐等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或"东方国家的奴隶制度"。杜畏之、李季、胡秋原等人认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东方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反对机械套用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演进的四种形态。

联系实际，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探寻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

这场论战无论是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认识，关于中国社会史认识，还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认识，三大领域的认识论战反映到政治实践中，其实质问题就是：站到革命的阵营，还是站到反对革命的阵营。

## 四、科学的国情判断和正确的道路抉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情分析、科学判断：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必须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思想文化界大论战的同时，相比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实践中，更加深入社会，直接接触广大人民群众，并且自觉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工作，继而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加以理论概括和总结，一步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具体结合和理论创新。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调查文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论著，论证和回答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参与中

---

[1]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从“新思潮派”与托派、“动力派”之间论战开始。1933 年 7 月，《新中华》杂志 1 卷第 14 期刊发了刘梦飞（张闻天）的《中国农村经济的现阶段——任曙、严灵峰先生的理论批评》文章，对严灵峰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和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诸论》两书中关于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已占支配地位以及土地问题、租佃关系等论断进行批驳，认为“目前中国农村经济的特质是：由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经济”。之后，形成两大阵营，一方以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为主要成员，另一方以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王景波等为主要成员。双方以《中国农村》与《中国经济》、《益世报》副刊“农村周刊”等为主要阵地。

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的共产党人以及在论战影响下的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先后抵达陕北，他们对认清国情的极端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认，基本国情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从此为全党所认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新任务，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1941 年 3 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了系统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③]之后，中共中央还正式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1938 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学会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的要求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之后，又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论著，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问题等基本理论作了完整论述，这些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33 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18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01 页。

大理论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不但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而且找到了理论灯塔,即适合自己的指导思想上的科学体系。

## 第四节　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党对军队的领导

###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新型军队改造

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是与对武装力量重要性的认识和建立自己的特殊军队分不开的,这支军队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人民军队,而且是新型的人民军队,其新型在于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有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有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铁的纪律,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回顾党的建军历程就能够看得很清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毛泽东特别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次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开始对部队进行改编(即三湾改编),在军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规定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长官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建立士兵委员会。这些措施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

民的自由散漫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928年5月4日在宁冈砻市举行的庆祝朱、毛两军会师并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红四军)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军队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三大任务是：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报告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其中对红军状况作了分析概括：红军成分，一部分是个人、农民，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士兵的物质生活，十分困苦。好在苦惯了。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艰苦，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长官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①]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指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并指出游击战术之一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②]

1929年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村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该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创建到壮大的丰富经验，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面对军队成分的复杂性和党员成分来源的多样化，该决议强调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建军思想和建党思想，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付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第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决议批评了单纯军事的观点，指出：这种军事观点认为军事与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这种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各项重大的任务。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人民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纲领，使红军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肃清旧军队的影响，完全成为了真正的人民军队。

1931年7月7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文章，指出创造铁的红军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铁的红军必须具备以下六个基本条件：第一，确定红军的阶级性。红军是工农红军，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第二，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政治部及政治处）实行它的领导作用。党和团的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红色战斗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的战斗力和纪律。第三，政治训练的重要。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第四，军事技术的提高。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不仅在战争中特别加强了技术的作用，使用技术的知识训练也复杂了，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变更了战术的原则。第五，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红军的纪律，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地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第六，要有指挥和统一的训练。红军是苏维埃政权中的特殊组织，它不仅要完成中国工农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要成为创造并保卫社会主义的柱石。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①]

人民军队要同旧军阀区别开来，必须进行整顿军风军纪，彻底肃清

---

① 朱德：《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8—492页。

军阀习气，1943 年 1 月 16 日，谭政在《肃清军阀主义倾向》报告提纲中列举了军阀主义倾向的六种表现，必须加以整顿和克服，第一种表现是某些干部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想要造成一种力量，培植一个系统，拉拢一些干部。第二种表现是官兵关系不正常，官兵之间脱节。第三种表现是干部关系不正常，总是相互恭维，争地位，比高低。第四种表现是军民关系恶化，军队与地方关系极不正常。第五种表现是政治工作应有的职权与地位被忽视、被抹煞，使政治工作的威信降低。第六种表现是个人特殊化现象，贪污腐化现象等。并且指出：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是原则的斗争，是党的原则克服军阀主义原则的斗争。[①]

新型的军队通过几方面的重要关系体现出来，这就是军与民的关系、军与政的关系、军与党的关系、军队内部官与兵的关系、干部之间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教育工作自己的关系等。1943 年 11 月 29 日毛泽东在《组织起来》文章中指出："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绝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长官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们的军队，历来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②]

## 二、马克思主义的建军思想

新型军队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1943 年 4 月 16 日朱德总司令在《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中指出："学习用马列主义的原则，学习用革命的办法来管理我们革命的军队，是目前第一等重要的事情。"[③]

---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65—79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第一版，第 1192 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83 页。

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文章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同年 9 月 18 日又在《坚持为人民服务》文章中指出："因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②]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文章中进一步明确了军队的性质和宗旨："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惟一宗旨。"[③]

1949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文章中指出："这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④]

军队的政治工作、思想改造、官兵关系通过作战、生产劳动等体现出来。毛泽东指出："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

①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第一版，第 1188—1189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第一版，第 1189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第一版，第 1189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第一版，第 1192 页。

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①]

总的来说，人民军队是新型的军队，其建军思想主要包括：（一）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作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惟一宗旨；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等。（二）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军队实行党代表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等。（三）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断纠正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拥军爱民、拥军优属；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四）人民军队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军队内部的民主是增强战斗力、支持长期战争的重要武器。（五）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六）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加强群众练兵、军事、政治素质训练和文化教育。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 页。

# 第四章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主流文化的变革[①]

文化是国情民情的重要标志，具有自身的历史承续性，而我国百年来的文化变革非常显著，有着自身的历史脉络。鸦片战争以降一百五十多年里，中国文化经历了思变、危机、变革、复兴的曲折历程，世界潮流和国内社会变革是其外在诱因和内在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深相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深相结合，它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也包含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变革道路。要对文化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需要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化的变革之路，以把好中国文化变革之脉。

① 本章部分内容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

## 第一节　现代化运动与文化变革

### 一、文化危机、文化觉醒与现代化的文化运动

古代中国文化有过长期的辉煌历史，与之互为支撑的是中国长期的农业文明。然而到了近代，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含科技教育等）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严重危机。在现代化这一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潮流中，旧中国封建主义的价值体系不可能提供现代化的精神资源，也难以抵挡西方列强等外部势力的冲击。因为中国这一次遇到的不仅是强势民族的入侵，而且还有工业文明的挑战。旧王朝的彻底失败说明，封建的农业文明不可能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平行发展、和平共处，而且其生死较量是以民族欺凌的形式展开的，其结果是，以朝贡体系为标志的东方等级秩序的湮灭，取而代之的是以殖民体系为标志的西方强权秩序。虽然中国人依然保存着自己的大同梦，但不得不放弃旧的天下观，而去接受西洋版本的万国公法理念。因此，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这场世纪灾难，带给中国人的既有包含制度在内的器物层面的物质危机，也有包括伦理习俗在内的文化层面的精神危机。

然而，危机的客观现实与对危机的主观认识并非完全一致。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说，中国人是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第一次在鸦片战争后，国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即经济、军事等物质上的技不如人，于是便有了晚清早期的洋务运动；第二次在甲午战争后，国人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晚清人士拿“变法维新”作一面社会运动旗帜；第三次在辛亥革命使清政府垮台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制度建立的民国所希望的事件落空，两次帝制复辟，人们渐渐认识到中国

需要全社会人格的觉醒，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下消极的国民人格、保守的文化心理、顽固的道德意识，乃是专制制度死而不僵的魂灵，必须打破封建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的文化僵滞之局。

伴随中华帝国衰落的，是旧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嬗变。中国人要开启以西方工业文明为参照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农业文明下的传统结构性习俗和封建文化的衰落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反映，因此在追求物质上的现代化和制度上的现代化均不如意之后，从文化上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追求就进入议事日程。当然，这种追求现代化的文化变革进程一开始就遭遇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冲突。虽然文化冲突与军事、经济、政治冲突搀和在一起，军事经济实力落后更容易让人清醒，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还是及时掀起了一波让国人觉醒的文化运动。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即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价值体系受到重创，新文化运动打出的旗号之一便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可看作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早期文化自觉，陈独秀称之为“吾人最后之觉悟”：“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此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于是，各种思潮、流派应运而生，并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争鸣、角逐，但其各自的最终命运则取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抉择。

## 二、文化改造与社会变革的内在统一

在历经洋务运动、清朝覆灭、建立民国等一系列经济、政治的社会变

① 陈独秀：《独秀文存》[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1页。

革之后，似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依然停留于表层，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也不能使中国的文化很快“现代”起来。鲁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所经历的思想蜕变，充分展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界主流的跳动脉搏。鲁迅对中国社会改革和文化革新的艰难性有着充分的估量，他发出沉重的呐喊：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革命推翻了帝制，然而革命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共和的招牌下，社会思想潜存的保守性和习惯势力，如化石般令人吃惊。新文化运动也不断遭遇旧势力的反扑，“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鲁迅以社会进化论的眼光和标准深刻鞭挞了中国国民性中保守、停滞的弱点，却未能及时找到社会变革的力量和理想途径，从而发出“持戈独彷徨”的感叹。

然而，鲁迅后期的社会改革思想与阶级利益、阶级斗争观结合在一起。这时他看到的已不仅仅是中国农民身上的弱点和病态，也看到了中国劳苦大众在被几千年封建势力摧残下依然顽强的生命力。正是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那里，鲁迅看到了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中国的筋骨和脊梁。鲁迅最终认识到，要推动中国的进步，新时代的启蒙者不仅要启发人们的自我意识，促使人觉醒，而且要为从梦中醒来的人们指出社会进步和自我解救的现实道路，而社会变革是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鲁迅把文化启蒙和文化改造的重点放在中国文化的最顽固部分，即对由数千年封建传统积淀形成的礼俗、习惯和国民心理的改造上。他强调必须将文化改造深入到广大社会民众之中，反对将文化囿于少数“精英”之中，他指出：“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的满足。”[①]文化运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到社会深层才能真正推动历史的进步。鲁迅这一思想的深刻性，内含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进性和阶级性。

---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21 页。

## 三、文化抉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伴随社会变革和文化运动，在中国出现了各种思想文化流派，因而也存在对文化革新、改造的多种路径选择。五四运动之后，首先爆发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抉择上的主义之争。其中在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之间展开了三次大论战。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中国历史的最终肯定而开花结果。

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反映了这种抉择的发展脉络。陈独秀曾是反传统和主张西化的急先锋。五四运动前，构成其人生观和历史观基本内核的是西方个人主义和进化论。他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适合现代生活需要，而个人主义、个人需要、个人幸福、个人自由等一系列外来概念，成了他反对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建立新道德、新文化的价值尺度，成为衡量宗教、法律、道德、政治的基本标准。他在写于1916年的"人生真义"九条中主要表达了如下观点：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应该尊重；执行意志，满足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能不变；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所以乐生的愿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社会的组织秩序之所以应该受到尊重，只是因为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因此社会不能解散，等等。他这里追求的是西洋近世文明，批判儒家伦理，其目的在于掀动一场道德革命，使国民人格和文化心理得以重建。陈独秀早期的这些思想概念，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早期进步知识分子所寻求的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怀疑精神和以生活进步和个人幸福为基本追求的变革愿望。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发表于1919年12月《新

青年》的宣言[①]已经去掉有关追求“个人的享乐”的人生观，开始向往和倡导“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社会理想，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这时的国民人格改造目的，已经不只是满足欲望的个人生存，而是必须希望“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其实现途径已经不只是个人奋斗，而是必须经过“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他把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启蒙引入了不仅与政治相结合，而且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社会革命之路。正是在这里，文化意识与政治意识才得以内在统一，文化自觉才能发展为政治自觉。有了这种政治自觉，他才从原来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转向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才有后来建立在阶级意识基础上的政治意识的成熟，而阶级意识的成熟是政党产生的思想和文化前提，这正是“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②] 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代，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改变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而且在中国社会开启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各种“主义”激烈斗争之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逐渐沿着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转变在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身上表现为：由新文化运动早期单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反对封建旧文化的启蒙意识，转变为用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时展开批判。

总结各种主义在中国角逐的成败得失可以知道，任何一种主义取得胜利都不是由论战本身所决定的，而是必须具备取胜的要素。首先，它必须蕴含中国社会变革所急需的价值资源，在传统价值体系已经残缺不全的背景下，新的价值体系必须对之加以彻底改造，使传统价值体系脱

---

① 陈独秀：《独秀文存》[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44—245 页。

② 陈独秀：《独秀文存》[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621 页。

胎换骨。其次，它必须是世界文明最新发展的文化集大成者。在西方殖民文化劣根性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于世人面前之后，中华民族深切认识道："要先进文明，但不要西方列强的殖民文化"，这是民族的呼声，也是社会各阶层的认同。第三，它必须能够与中国现实社会相融，并且融于文化深层和社会整体的变革之中，而不是流于表面和形式。文化的变革不但需要来自社会上层的精英文化自觉，而且必须赋予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次变动，也就是说需要全社会的革命性动员。五四以前的中国，从技术救国、共和主义到新文化运动，都不能满足这个条件。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结果主要表现为两种趋势，倾向于社会主义者，虽然坚持"主义"，但开始主动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具体问题，以寻找解决问题和社会变革的具体道路。而宣扬西方自由主义者，虽然从强调解决"问题"开始，结果反而多去"整理国故"了，缺少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就提不出切实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并没有正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紧要的变革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不管什么人坚持什么主张，他都必须能够将自己的主张贯彻到现实的社会土壤里，投身到社会改革的实践中去。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新

###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进步性

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文化观被中国的先进分子即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所掌握，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运动密切结合，生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顺应历史发展、反映时代要求，

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历史进步性和优秀品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致，甚至从一开始就同中国封建文化因性质不同而产生冲突。根据目前理论界的研究，至少存在如下几方面的不一致：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的“圣人史观”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充满辩证法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庸思想、调和论等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独立、自由、解放以及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忠君观念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尊重规律、尊重生产实践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迷信思想和直觉主义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并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学说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经验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大生产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小商品意识不一致，等等。这些不一致的本质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它与农业文明基础上生成的封建文化之间的不合是历史的必然。

虽然在事关人类共同理想的文化观念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反剥削反压迫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等贵贱”等一些朴素思想要求，在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建立在不同经济基础之上的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理想。马克思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本质差别，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传播并不等于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扎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融入中国社会非要经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的文化自觉并与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不可，这就是历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程中找到自己的接受者、传播者和社会实践者。

五四运动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在于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最先进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所掌握，并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初步形成了先进阶级的文化自觉。五四运动因此

成为中国文化迈向现代化征程的真正开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就是第一个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认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具有指导意义的第一人。他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尖锐指出传统伦理的基础是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宗法家族制度，儒家伦理之所以在中国居统治地位两千年之久，是因为适应中国两千年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他同时批判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封建复古倾向，认为近代西方的工业经济必然冲击中国的农业经济，西方的人权平等和民主政治必然动摇中国的专制政治，由此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伦理基础，代替封建统治阶级伦理体系的必然是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劳动人民的新伦理文化，从而论证了文化变革以新道德代替旧伦理的历史必然性。继李大钊之后，瞿秋白、陈独秀、萧楚女、恽代英、李达等也较早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文化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的方法论。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准确把握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通过科学论证和实践赢得了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胜利，并把历史主题和价值主题同时成功地进行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学术风气，引领了社会思潮；同时又探索出一条可行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出的目标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些口号和政策主张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其中内含的富强、平等、民主、科学、权利，以及其中包含的道义原则，彻底颠覆了旧的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了主体文化和文化主体的双重变革，重建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不但对广大民众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而且对于各派知识精英具有统合作用，从而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解决的两大问题就是，找到实践力量和进行指导理论的创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动员、大众文化改造和理论创新，带领中国人民不仅成功

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并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方略，从此，中国先进阶级与先进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革实践。

## 二、多学科的体系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学术的构建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接言说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或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吸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基本原理，将观念革新与各个具体学科的革新密切结合起来，促进了观念系统、知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化，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史学前面已经提及，这里简要说明一下其他学科。

中国先进分子较早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与精神》、《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李达编写的《现代社会学》(以及后来撰写的具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学大纲》)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翻译出版了《自然辩证法》、《哲学之贫困》、《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等著作。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进一步成熟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应该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最为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方面的贡献和成就也是最大的，以《矛盾论》、《实践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著作，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哲学形态，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大量翻译出版主要从五四运动后开始，30、40年代数量激增。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19年《晨报》副刊发表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和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文翻译版。1932年郭沫若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33年吴清友翻译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48年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全译本，等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分析、关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分析、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运用马列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例子。之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讨论、关于中国产业革命的分析、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深入农村、工厂进行社会调查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得出符合国情的结论，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于中国的成果也很多，比如人们熟知的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马寅初的《中国经济之改造》，郭大力的《生产建设论》，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后新版书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等等，也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作品。

20世纪初中国文学领域不断爆发最为活跃和斗争激烈的革命运动，其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和文学家，开始批判那些脱离实际、脱离革命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那些无视工人阶级和农民生活描写、不愿歌颂劳动以及缺乏阶级观点的状况，如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新诗人的棒喝》，恽代英的《文学与革命》、《告研究文学的青年》，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的艺术》，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等。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属鲁迅的小说：《呐喊》、《狂人日记》、《药》、《祝福》、《阿Q正传》等十多篇新文学经典作品，它们在深刻揭露旧中国国民性消极点的

同时，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黑暗现实，唤醒人们的抗争意识。其他著名文学家如叶圣陶、沈雁冰、郭沫若、郁达夫、许地山、闻一多、刘大白、刘半农、朱自清、徐志摩、田汉、洪深等许多小说、诗歌、戏剧作品，在当时的思想界、文艺界都产生过非常积极的社会影响。1930 年 3 月正式成立"左联"(上海左翼作家联盟)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中的运用走向深入，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作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进一步强调作家要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同旧社会和各种反对势力作斗争，培养和扩大新文艺的新生力量等。之后，许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文艺工作者脱颖而出，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经典作品在 30 年代问世，除了有鲁迅的杂文、瞿秋白的杂文和高尔基的翻译作品之外，还有人们熟知的茅盾(沈雁冰)的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巴金的小说《家》，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曹禺的小说《雷雨》、《日出》，臧克家的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艾青的诗《火把》，聂耳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以及丁玲、沈从文、蒋光慈、张天翼、沙丁、萧军、萧红、殷夫、丰子恺等著名作家的作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思想中的成熟展现，应该说是以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为标志的。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阶段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结论，也标志着中国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自觉。以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为认识升华的向导，1942 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几次讲话，最后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阐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体系，回答了革命文艺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动员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提高认识、改造世界观，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以此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创作空前繁荣，革命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如人们熟知的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孙犁的小说《荷花淀》，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新编剧《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冼星海的大合唱歌曲《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贺绿汀的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等。这种文艺导向和创作热情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推动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改造都产生了建设性的影响，大大触动了相关领域人的思想观念更新，也为新中国的各项新制度、新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先导和理论依据。这里仅仅提供挂一漏万的例证导引，其他许多方面的类似变革就不再一一叙述。

## 第三节　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曲折发展

### 一、新中国文化改造的历史承续与改革开放后文化的多样化

新中国成立后，推动文化改造进程这一主题更为突出，因为建立新社会必然要求实现价值系统的转变，为重建经济、政治、社会秩序寻求新的文化价值资源。这是新中国文化重建的两大任务。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必将成为国

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确立新中国人民大众文化的主体地位。文化价值的重建也意味着党的理想追求要落实到国家和社会的现实实践之中。民主革命的继续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相辅相成，具有同步性，从而赋予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改造两种构建形态并存的特殊意义。为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文化教育和改造的实践活动，极大地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并对旧有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改革，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新生政权基础的巩固，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资源。

文化包含有社会文化（如习俗、道德伦理等）、政治文化（如传统官本位思想观念体系）、经济文化（如小农经济下的男耕女织风尚）、精神文化（文学、艺术等）。现代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综合变动，文化的变革也应该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的综合变迁过程。而且这一变迁必须以现代工业文明的形成和扩展过程为其动力纽带，尤其是以生产力革命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为基础。

虽然政治文化是文化的最重要部分，政治文化的进步可以带动整个文化的进步，但文化的社会部分（如习俗、道德伦理等）、经济生活层面（如小农意识、惰性心理、因循守旧心态等反映形式）并不直接与政治体制发生直接联系，其变革更多地依赖生活模式和生产模式的变迁。滞后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模式变迁不但阻碍先进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文化的产生，而且会使政治文化难以健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左”的观念和实践抑制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基础性资源严重缺失、突出政治文化背景下，整个社会的政治热情过分高涨，以至于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和动乱。文化发展中出现的偏差，在相当程度上是商品经济的缺乏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缺少商品经济，社会必然缺乏对竞争规则和法律规范的渴求。“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

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摆脱了许多思想上的枷锁和禁锢，推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封闭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在是非观、价值观等方面出现了强烈的震荡。改革开放改变了传统心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权利关系的发展，激活了人们的现代主体意识：政治上、经济上自由度大增，自由意识确立；通过各种渠道介入国家和基层政治生活，参与认同的现代心理逐渐取代盲目顺从的传统心态；个性开始得到尊重和体现，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观念增强，独立人格形成；开始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治观念增强；市场经济的压力使人们的头脑大大地灵活，有了新的城乡观念、致富观念，开放心理形成。

改革开放在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的同时，也吸收西方的文学艺术甚至生活样式。在对待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上，反思传统文化的优劣，剥离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提炼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成分，使民族传统得以延续，民族精华得以弘扬，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随着中国国家影响力不断增强，我们在大量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展，并成为民族的自信力和国家的软实力。

## 二、新的挑战与文化建设的新使命

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和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文化建设的任务依然繁重。原因就在于文化现代化比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建设更为复杂和艰难，要求更高。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阶

段都包括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代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①]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深刻变化，推动着社会的转型，并形成转型时代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特征，由于转型时期新旧体系并存，因而这种特征就是新旧二元并存的局面，即兼有新旧两种社会文化类型的因素，面临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整合的挑战。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加，生活在这些二元结构中的人们在家庭、婚姻、道德、习惯、心理、思维方式等文化价值取向上产生变化和矛盾，传统的因素与现代的因素同时在发挥作用，影响着社会和人的文化生活，从而造成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比如，一方面是与现代化和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法治环境要求和民主决策、自主经营、人才管理机制及其由此形成的守法、诚信、民主、平等、权利、竞争、效益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是传统经济和社会生活环境及其惰性机制所产生的官本位心理、特权思想、长官意志、小农意识、任人唯亲的行为习惯、个人权利意识缺乏、法治观念淡薄等。

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与交融错综复杂，文化的交流、渗透、冲撞、互补、借鉴既成为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同时又带来诸多的紧迫问题。比如，青少年成长教育问题，双重人格问题，社会理想不同程度的迷失等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及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命题，提升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定位，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发展的高瞻远瞩。1985 年邓小平告诫全党：“我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决心迅速

---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 9 页。

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①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同步加强。现代化问题学者英格尔斯说过：“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得以实现。”②社会主义应该产生出与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价值体系，然而，在多样价值观存在的转型社会，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引领机制相对滞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如封建意识的残余、资产阶级思想以及貌似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等依然存在，并与社会主义争夺阵地。因此，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与社会主义思想观念三者之间形成共同一致的精神指向和现实机制，才能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实现。

虽然在当代，经济振兴、国家强盛已经成为各国一致的追求，但这一历史主题在中国的实践不能淹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主题，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就难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不会把我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时承载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历史主题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价值主题，并在实践中将两者达成统一，形成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为了适应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化，我们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而这一价值体系只有与人民群众所期盼的价值观改造目标对接才能具有实践性。这一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43—144 页。
②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 页。

价值体系既要有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的价值期盼，如平等、自主、自强，也要有体现精神文明的价值期盼，如公正、友爱、和谐，还要有体现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价值期盼，如互助、共享、奉献等。党带领人民群众自觉地将这些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主题在实践中统合在一起，促成历史主题与价值主题的内在一致，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获得先进文化的强大推动力。

## 三、文化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前进方向

新时期的文化发展必须首先要搞清楚我们的文化往哪里发展，这就需要在总结中国百年文化发展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对我国文化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所认识，在对现实文化状况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有所认识，从而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切实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一，百年中国变革的失败、曲折、成功都有文化变革成败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始于中国文化变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于先进文化的引领、传播和发展。21 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与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密切相关，与民心关系密切，我们必须同时抓好民生与民心两大工程，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胜利。

第二，百年文化变革从反封建专制文化开始，新文化运动中有过西化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反西方殖民文化潮，也有过复古潮，最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有开阔的胸怀，需要积极吸纳世界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包括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时代精神，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促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在商品经济历史阶段，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健康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前奏。应该承认，在市场和金钱效应之下，存在非商品领域商品化的现象，甚至不时出现出卖道德良心的丑恶行径，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也能闻到铜臭味。我们不能让一切都成为商品，让一切都交给市场来检验和淘汰。要使高度的精神文明成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必须使之首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坐标，否则，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四个字就成了讽刺。

第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发展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面，文化改革应该促进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在产业更新换代的改革进程中，文化产业应该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中国文化及其文化产品应该为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升提供重要支撑。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必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和传播的主渠道。

总之，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真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无疑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 四、坚持唯物史观，摸索思想文化新规律、应对新变化

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告诉我们，一方面，社会存在发

生变化必然反映到社会意识领域;另一方面,社会意识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社会意识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存在的成熟条件。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发生巨大变化,之前行之有效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管理模式可能不再有效,需要改进、创新,跟上形势需要。为此,要认真研究新时期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关系的新特点,从实际出发,既要正视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化,深入到现象的背后,找出各种变化的深层原因,对症下药;又要认识到思想文化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取决于现实条件是否成熟,有赖于改革发展进一步创造条件。

第二,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有赖于形成百虑而一致的思想文化观念。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与社会生活领域价值观的多元化复杂局面之间的关系,研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的方式方法,努力达成"百虑"而"一致"的良好局面。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以民主、救亡等号召为基础,建立起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成为新民主主义的一项制胜法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很长时期,要用民族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作为实现中国梦的统领号角,统一内外宣传,形成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共识,凝聚人心,凝聚力量。

第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两者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高度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努力做到社会主义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对以往制度的明显超越,不仅在于能够大力解放和发展物质生产力,而且在于能够大力解放和发展精神生产力,既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又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宣传思想工作在功能定位上必须有高度,在主题的旗帜鲜明上必须有力度。

第四,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着眼于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必须运用科

技手段和激励机制，满足时代发展不断提出的创新要求和新需求。拓宽宣传思想工作的主渠道，注重社会效益，同时，媒体管理要遵循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外部约束与自我约束的统一。宣传思想工作本身应该着眼于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宣传思想工作主渠道不能与实体经济部门模糊在一起，不能凸显部门利益，更不能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活动，因此，要使从事宣传思想工作者有一定的责、权、利保障。时代在发展，高科技、新媒体不断涌现，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适应新情况、运用新手段、拓宽新渠道、克服新困难、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发展。认真探讨网络信息时代媒体平台管理的新规律、新方法，坚持党管媒体、依法治理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针，建立健全媒体评价体系、奖惩体制和有序竞争机制，使媒体既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又承担社会责任，努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媒体。

第五，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能力，激发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力。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群体，需要更加积极、更加热情地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产生力量。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洪流之中，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实践、躲进书斋，更不能对改革开放和一线实践创新成果视而不见，深入实践更能唤起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贴近国情、民情，才能形成与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利益相一致的价值认同，自觉抵御各种不良思潮的外部侵袭，打造具有中国气派的知识群体。

第六，发挥人民群众无限的首创精神，让理论掌握群众，不断创新宣传思想领域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我们党在长期的宣传思想工作实践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言行一致为收效的前提，为此，宣传思想工作要做到真实和平实。没有真实感，就容易产生空虚感，思想观念领域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个认识问题，必

须做到公开宣传与实际行动的统一，让理想宣传与实际感受一致。比如在惩恶扬善上，要有与宣传舆论相配套的政策措施，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转变工作作风，树新风、立正气，深入基层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并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这种转变。

# 第五章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结果是全方位的，人们宣传最多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两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新中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包括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各项具体制度。除此之外，人们还应该明白，还有范围更广更大的变化，这就是整个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巨大变化与马克思主义极大的正相关性。除了已经叙述的中国文化的变革之外，这里仅从中国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中国妇女的解放和发展等方面例证加以说明。

## 第一节　中国的民族解放与民族政策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世界近现代史上爆发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都是为了争取人的平

等和民族平等的权力。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也是关于人的解放、民族解放的理论，而且是更为彻底的人的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理论。中华民族本身是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含着固有的五十六个民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中国共产党较早形成了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的正确认识，制定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法规，新中国并没有简单照抄照搬苏联的民族政策模式，而是根据自身实际，较好地解决了自己国内的民族问题，使得中华民族形成多民族和睦相处的大家庭，这在世界上也是个创举。

中国共产党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受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俄经验的影响较大。早期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的这些民族理论文献包括：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民族理论文献：《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等等。

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论民族自决权》（列宁）、《论民族殖民地问题》（列宁）、《论民族问题》（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斯大林），等等。

受上述著述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发表一批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和书籍，包括《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瞿秋白 1924 年文章）、《社会进化史》（蔡和森 1924 年书籍）、《民族问题》（李达 1929 年书籍），等等。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举办过关于民族问题的讲座，其中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杨松作了三篇讲座，分别为《论民族》、《论资本主义时代民主运动与民族问题》、《论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殖民地民族解放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越来越

多的民族理论著述也不断问世，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1980 年)、《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1987 年)、《列宁论民族问题》(1987 年)、《斯大林论民族问题》(1990 年)、《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1994 年)，等等。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和实践成熟发展。1992 年 1 月 14 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召开的首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主题是：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它开创了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方式，来确立改革开放各个阶段民族工作最重要的指导性原则与最重大的战略主张的先例。

2005 年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下发 10 号文件，把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与政策概括为 12 条：

1. 民族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2. 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3. 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

4. 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

6. 祖国统一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我国的民族问题是我国内部事务，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

7. 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

8.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

9.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10.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

11. 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

12. 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

这12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理论方面的新发展和解决民族问题实践探索的新成果，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

## 二、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着眼点

### （一）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九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①]

第六章专门规定民族政策。[②] 其中：

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地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0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7—768页。

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二）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习俗

第五十三条：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途中先后经过西南苗族、瑶族、壮族、侗族、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地，红军政治部颁发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对苗族的标语口号》、《关于注意与苗族的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和纪律，反对进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尽量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少数民族帮助，以实际行动贯彻民族平等原则。红军一路上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例如，1935 年 5 月，刘伯承率领红军先锋队进入彝族地区，将没收的汉族豪绅的财物同样分给彝族贫苦群众，并且在彝族沽基家支头人小叶丹的要求下，刘伯承与小叶丹杀鸡饮血，结为盟友，传为佳话。

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制定的政策也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区别，比如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中，针对一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民族关系复杂，宗教影响广泛深入，地处偏远等特点，少数民族地区则尽量采取和平土改的方法，即用和平的方式，一般不通过强力斗争，通过启发教育、争取少数民族上层配合、尽量缩小打击面、加强民族团结等，来实现平稳土改的目的。

（三）坚持民族平等联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政权体制与民族的关系，必须放到世界历史和现代化进程中看。所谓现代主权国家，最初发端于欧洲建立的民族国家，它是世俗政治摆脱宗教束缚的标志，即按照民族和地域分割建立起政教分离的君主制国家，后来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和工业革命推动下，君权国家逐渐被主

权在民的共和制国家所代替。但在欧洲列强向外扩张的国际殖民体系下，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主权独立意识不断增强。这里就引出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民族自决与主权统一的关系。这个问题需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一方面，从摆脱封建神权专制和殖民统治的方面看，必须捍卫世俗政治和民族的独立解放，这就是提出民族自决口号的进步性和积极一面；另一方面，从工业化、现代化的商品经济发展方面看，现代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尽量大地统一国内市场，消除妨碍经济快速发展的族域和地域分割，而且这不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家的发家，而且有利于社会化的大工业、农业、商业、贸易发展。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也建议德国工人党“不仅要力求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还要及其坚决地把这个共和国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①]

但是，无论是民族独立运动，还是主权或集权的国家统一和现代化进程，都与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并不矛盾，更不应该排斥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解放的正当要求。所以，在俄国十月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政府之后，列宁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地，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②]而且，列宁还强调：“凡是国内居民生活习惯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主和自治”[③]，没有民族自治就不可能设想有真正民主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政治体制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在党刚刚诞生时期，曾经将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与自由邦联制联系起来，这在第二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有所反映。有照搬苏联联邦制的痕迹。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认识的成熟，党从我国多民族的实际出发，考虑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紧密和不同民族之间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37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9—30 页。
③ 《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43—144 页。

域分布交错、散居、杂居等特点，逐渐放弃了联邦制和邦联制的主张，找到了更为适合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民族政治体制。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各少数民族都有平等权利，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中应有他们的位置。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的态度和各族人民接触，使各民族之间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有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要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范例。全国解放前夕制订的《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2年8月9日新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又先后成立了新疆、广西、宁夏、西藏自治区和一大批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

应该说，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主要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解决中国民族实际问题出发的一项重要创造发明，这一制度保证了一个多民族大国的和平稳定发展。

### （四）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

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电告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就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等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省份的政府工作作出批示，嘱咐在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或干部训练学校，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

是不可能的。”[①]

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也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需要。要真正做到让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方方面面的事务，没有大量有知识、有觉悟的干部队伍是不可能完成的。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起草报告中强调：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改造，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29页。)新中国还培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医生、工程师、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大大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口发展。

（五）反对大汉族主义

1953年3月1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关于民族关系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出必须消除新中国成立初期依然严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

在分析大汉族主义的性质和阶级根源时，毛泽东指出：“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况，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②]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群众，大力公开批判大汉族主义：“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教育党员和人民。”①

1955年3月31日，在党的八大召开前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向大会讲了少数民族工作问题，再次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并且说明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②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讲的第六个关系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以苏联民族问题为鉴，提出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现实中要着重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并且分析了旧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血缘关系，指出了大汉族主义的阶级根源：“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并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③

---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27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 （六）着眼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民族解放和民族繁荣昌盛是一切民族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者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文化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发展。邓小平于1987年6月29日指出："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①

由于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人口相对稀少和科技相对落后，比如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中央政府分别实行了汉人移民或驻地部队帮助生产的办法，但这种方式往往引起某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曲解和歪曲。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如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广大的草原，人口又不多，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那里有不少汉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坏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②

当然，在文革时期，极"左"路线也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但这并没有动摇党一贯坚持的民族平等原则，对此，邓小平1987年说："至于说'文化大革命'使少数民族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不能表明我们歧视少数民族。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

那时不仅损害了少数民族，受害最大的还是汉族，大多数老一辈的革命家都被打倒了嘛，这些人几乎都是汉族嘛，包括我在内。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并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中国有几十个民族，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行政机构中少数民族干部所占比例大大超过百分之六”。[①]

## 第二节　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妇女工作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主张

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男尊女卑是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规范，妇女处于附属地位，是男人的附庸，深受压迫。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程度加深，表现为政治上妇女无任何权力，甚至连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经济上遭受残酷剥削，妇女工资只有男人的几分之一，文化上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处于文盲半文盲的愚昧状态，家庭生活上婚姻不能自主，随时遭受殴打、凌辱等痛苦伤害。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中国妇女解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争取妇女解放的事业就与争取民主革命胜利和民族解放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妇女解放运动有了正确的方向和有力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二年即 1922 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形成《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该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6 页。

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这一决议案还提出了党为妇女奋斗的近期目标是:“(一)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二)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三)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①],并指出这些不过是为达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须经过的站驿,在私有财产制度下妇女真正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分析中国妇女问题,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崭新观点,深刻揭示了旧中国旧社会造成中国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是较早写文章公开揭露和抨击包办婚姻等封建弊端,呼吁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的。早在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针对湖南的赵五贞女士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严厉抨击了让妇女难以忍受的黑暗制度。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进一步归纳出封建专制的四条枷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②],其中夫权是一种专门针对妇女的枷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一起来,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妇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党及时制定关于妇女工作的指导方针,维护妇女地位,保障妇女权益。

1943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为此,需要从经济富裕与经济独立入手,让妇女参加经济生产,增加积蓄,改善生活条件,逐渐挣脱封建压迫。各根据地妇委会妇救会要以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为首要工作。另外,对妨碍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

身体健康致影响生产的，如小脚及不注意卫生等，应鼓励妇女改革之。对妇女文化的、政治的教育，应通过生产方式去进行，如提高生产技术，认识有关生产的文字，编制在生产时歌唱的小调等。”①

1948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妇女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明确规定重视妇女工作的具体要求，指出：

在土改运动中应该发动妇女参加，妇女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是一个重要力量。妇女不仅能做妇女工作，而且能参加政权的各部门工作、党的工作等，应发动妇女群众参加土改、支前、生产、管理政权等工作，提高妇女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实现妇女应得的各种权利，实现男女平等。“在土地改革中要保证妇女分得土地及所有权；妇女必须参加农会的领导；生产着重于农业与副业，学习并熟练技术；在民主运动中要为妇女获得民主自由及男女平等而斗争。”

提出了以下扫除封建束缚、妇女解放和权利保证的一系列口号：

“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

“婚姻自主”、

“废除买卖婚姻”、

“反对包办强迫婚姻”、

“禁止缠足”、

“禁止溺女”、

“家庭民主和睦”、

“妇女有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自由”等等。

该文件还规定：“各级农民代表会及农会委员会必须吸收妇女参加，妇联即为农会的妇女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设妇女工作的专门部门，

---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6—128 页。

或指定专人负责。党委应将妇女工作列入议程，定时讨论检查，改善对妇女工作干部的政治待遇。党应选派最好的女干部做妇女工作。农会妇女干部如系党员，应参加同级党委或列席会议。应加强培养女干部，吸收参加各种工作。"①

1948年12月20日，党中央展望即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新形势，对农村妇女工作发了一个更为详细的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了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下的妇女地位、党的妇女工作的定位和法制保障，分析了妇女解放道路上存在的旧传统障碍。指出：

"在新民主政权之下，过去旧社会一切束缚虐待妇女，使妇女处于服从或屈辱地位的法律，都已不复存在了，新的保障男女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完全平等的法律，在新民主政权建立的最初时期，就已经制订或是基本上已经制订了，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法律能够贯彻实现。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观念，和各样封建习俗的束缚，特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妇女在经济上要依靠男子，不善于从事各种劳动，甚至鄙视劳动的弱点，妨碍了妇女迅速实现法律上所规定了的权利。"②

因此，该文件提出农村妇女工作的要点就是，要使妇女充分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把劳动看成是光荣的事，积极参加体力上可以胜任的劳动生产工作，成为家庭财富和社会上财富的创造者，从而提升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使得男女平等的各项法律有充分实现的强固基础。另外，在生产过程中，要加强对于妇女的教育工作，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党员妇女参加民主建政，推进妇婴卫生，保护妇女特殊利益。对于阻碍妇女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封建思想传统习俗，必须有意识和有步骤地去消除之。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9—311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9页。

该决定还对妇女组织和妇女干部培养、任用等重要问题作了部署，并且对各级党委作了明确要求，指出："党应更进一步地纠正党内外残存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和把妇女工作从整个工作中除外的取消思想，以及孤立突出地去做妇女工作的偏向。各级党的组织应加强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妇女工作，培植完整的群众观点，准确地掌握妇运政策，克服妇女工作中的无纪律无政府现象。妇女工作者更应实事求是，深入群众，埋头苦干，全心全意为妇女群众服务，把妇女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①

## 二、新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

新中国确立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也有明确规定了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条文。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六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②1950 年 5 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强调保障妇女婚姻的自主权。1952 年中央进一步发出《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落实婚姻法的群众运动，从主观上消除封建婚姻观，从客观上彻底摧毁封建婚姻制度。1953 年的选举法规定男女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并且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新中国还成立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及各级地方民主妇女联合会，领导

---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34 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59 页。

妇女运动，组织联系妇女群众，保护妇女权益。

从观念和法律上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到实际的理想效果，有一个差距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其根本的客观制约因素就是现实物质文化基础的状况。对此，毛泽东1956年10月12日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作了论述。在谈到人民代表中男女比例问题时，毛泽东说："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①]

值得庆贺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妇女已经广泛参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妇女就业已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目前省部级妇女高官有200多位，女市长、女县长、女乡长、女局长更多，各级女干部、女公务员的占比已高于40%，涌现出一大批女企业家，有近4亿女性就业人员。与解放初期的妇女90%以上是文盲相比，当今妇女文化素质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现在不但基本上消除了文盲，而且妇女在高学历者的占比越来越高，在一些硕士、博士等高科技领域中女性高于男性的现象十分普遍。中国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明显高于男性，在奥运会等世界大型运动会上中国女运动员获得奖牌的数量不但超过男性同胞，而且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妇女解放的彻底性和中国妇女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精神。

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连续制定和颁布了三部《中国妇女发展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纲要》，即1995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2001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2011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各地方也相应制定了发展纲要，进一步把妇女发展的目标、任务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努力朝着实现妇女发展的科学化、法治化、民主化方向前进。

# 第六章
# 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发展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认知的难解之缘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思潮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关于社会主义的认知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社会主义作为实践从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失败的局部实验，到苏联开启、多国跟进的国家整体实践，也已经有近二百年的历史。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这些依然是世界范围的重大基本问题，在认识上不断引起争论，在实践上不断出现各不相同的模式。我们看到当今世界同时出现的两种相悖现状，一种情况是：一方面，资本主义几百年来一直在世界上强势扩张，对社会主义不断造成打压甚至致命性摧残；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逆势发展，发达国家内部也不断滋生生态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潮流。另一种情况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关于社会主义有了科学的论证；另一方面，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却不断地背离科学原理，不断地步入歧途。对于这些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 一、社会主义具有现实基础和顽强生命力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其自身滋生却自身又无法克服的事关人类生存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人的生存权、发展权问题，人的地位和尊严的严重差别，实际收入和权益的巨大分化，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等等。其中公正、平等问题最为突出。只要这些问题存在而又无法消除，人们对现实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就不会消失，对新制度的渴望和实践诉求就会不断产生，于是在最近几百年的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后，社会主义就不断产生和发展壮大，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平等、公正、和谐的各种主张，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乡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侧重点各异的现实运动，更有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各种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误不断，曲折之路漫漫，但社会主义命运并不因为挫折、曲折、失误而终结，因为现实存在深厚的土壤，这些深厚的土壤使社会主义作为消除现存弊端的新生命体不断孕育和诞生，资本主义越扩张引起的问题越多，否定资本主义的趋向越强，社会主义就越具有现实合法性基础，无法否定的就是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可能会在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受到挫折甚至失败，但很快会在另一些地区、一些国家产生，关于平等、公正、幸福、和谐、友爱等，从几百年前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开始，都始终是社会主义的诉求，因为这些是现实生活所缺少的，是人类社会最可贵的，是现存制度所无法带来的。而且随着人类的普遍觉醒，特别是广大底层劳动者觉悟的提高，这种诉求越强烈，对现存问题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就越具有根本性，对替代性的新社会制度的期待性也就越强，对社会主义的设计也就越理性、越成熟。这一点，我们通过比较几百年来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思想发展看得出来。

当然，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在大大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那些乌托邦色彩浓厚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教条式的说教，它们与拜金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相比，显然缺乏现实基础，所以，世界上信奉资本主义的人依然较多。反过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也一直具有很大影响力，社会主义宣传主张和实际运动在不断唤醒人们，迫使资本主义在体制上不断改良，正因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断吸取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资本主义并没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还在不断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在克服自身旧的小毛病的同时，却不断产生新的大毛病，在欧美地区隐藏其少许弊端的同时，却带给世界其他地区更大的危害。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世人在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危害性。所以恩格斯指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①] 尽管人们不一定找准社会主义的钥匙，但各种各样的尝试只会越来越丰富。

## 二、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认知

虽然社会主义在思想史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社会主义依然弱势，虽然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社会主义已经有了从空想到科学的理论经典，但许多人、许多国家还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搞社会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也只提供了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并没给出具体的答案，而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由社会矛盾基础上自发的行动与接受理论指导的自觉的行动两者复杂结合的，自发的行动往往具有盲目性，也往往缺少现实基础，而对理论的接受往往出现一知半解或曲解、盲目照搬等状况。科学理论真正被人们所掌握所运用并不简单，社会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2 页。

义为人们所正确实践也并非易事，还有许许多多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在制约着人们。马克思主义就是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主客观因素，努力创造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尽管现实中能够领会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并不多。

在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作的论证中，既有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彻底批判，又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在对两者的彻底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的主客观现实条件。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欧洲当时有些社会主义者不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以前的资产阶级启蒙者曾经宣传“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结果是：早先允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富有与贫穷的对立更加尖锐化；已经实现的摆脱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来说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犯罪现象一年比一年增多，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嫉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在看到并批判这些资本主义丑恶现象的同时，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偶然产生出来的天才人物。[1]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4—527 页。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端,消除这些弊端是思维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一节,专门分析了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实质、根源和社会危害。

第一类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也是贵族的社会主义、僧侣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他们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阶级,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德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于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时期,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地主、官僚等)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它叫嚣不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真理的要求,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8—529 页。

阶级。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第二类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他们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他们力图使无产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寄希望于资本与雇佣关系上的改良。

第三类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激烈的最初时期出现的。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想通过实验、示范等和平的途径来达到目的。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都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总是梦想用实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①]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了问题之所在，并且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64 页。

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①]并指出：正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只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②]

社会主义者寄予的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消灭阶级的期望实现的客观历史条件是什么呢？对此，恩格斯论述道：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相互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这些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力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2 页。

“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①

## 三、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社会主义观的纷繁复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上述各种社会主义，在当今看来还都是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出现的现象。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之后，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依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新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但资本主义并未很快衰亡，资本主义的改良思想体系中也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主张，比如新自由主义也有人道主义的趋势，拿自由、人权、公正作标榜，很容易混淆视听；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并没有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产生，社会主义有了多个国家的实践，新情况不断出现，在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个新问题，生产力和经济上的长期劣势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现成答案的情况下，认识的差异和混乱就会出现。于是，我们看到，不但欧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各种社会主义主张，解体前后的苏联、东欧也有不同的社会主义认识和主张。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当今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有多少人认为是关于社会公平、公正的思想，而达到公正的手段是多样的，比如法律、政策，不仅仅是社会制度，并且认为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二是大工业作为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3 页。

主义的物质基础；三是在相当长时间内的混合经济。当今俄罗斯实用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要与工人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等相适应，从现代人的共同感受、心情、群众情绪开始，以改变社会阶层的思维和文化因素为目标，而不是采取政治手段和进行历史前景的理想教育。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其开放性、包容与理论的非彻底性同在，理想性与实用性互动又存在悖论。[①]

在苏联、东欧巨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之际，拉美左翼运动的兴起却不断打出社会主义的口号。其背景是新自由主义盛行之后，拉美普遍出现经济凋零、贫富分化加剧、政局动荡、社会贫困、发展倒退等现象，在此背景之下，"左"派政治力量纷纷打出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并成功上台执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委内瑞拉在总统查韦斯上台后的打出的"拉美新社会主义"口号，他宣称："社会主义是走向生命和团结的道路，是爱的道路"，"社会主义是我国人民和人类摆脱资本主义堕落的唯一的解决办法"。他坚信人们需要越来越少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查韦斯的思想和政策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成分，主要表现在公开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维护下层民众的利益。查韦斯指出资本主义是走向不稳定、多数人贫穷、自私自利、仇恨和缺少团结的道路。资本主义不会从内部超越自己，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超越。他在1998年主政后推行一系列强劲改革。经济上进行土地改革、禁止石油矿业私有化、银行国有化等措施，认为单靠市场不能很好地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应该与市场相互结合。政治上颁布"第五共和国宪法"，将参众两院合并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扩大民众权力，提出参政民主、消除腐败、精简机构等口号。社会方面主张所有国民享有国家保健、教育和养老金保险，强调发展经济和克服占国家人口八成的贫困问

---

① 参见项国兰："当今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思想"，载《200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选编》，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第855—861页。

题和严重的失业问题等。对外政策上主张维护本国和本地区利益，增进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加快拉美一体化进程，反对美国的强权和干预，等等。

但查韦斯在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也不赞成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所以冠以"拉美新社会主义"、"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等称号。其实，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更接近于平民主义。它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也不是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共产党为最高领导，其核心思想主要受到西蒙·玻利瓦尔主义的影响，最高领导机构是全国爱国委员会。查韦斯说自己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产主义者。①

总之，现实的社会主义如何搞，是没有现成答案的，更多地是在具体实践中进行各自的探索。邓小平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你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②

## 第二节　中国的社会主义认知和实践探索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从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真正实践社会主义创造了历史条件，使中国人民能够按照自己对

① 参见陶文昭："查韦斯的社会主义"，载《200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选编》，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第867—87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社会主义的认识来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了。当然这种认识最初受到早已诞生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的极大影响,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书面著作的影响,但最终还是要接受中国国情的实践考验。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中国化之后,再次面临社会主义和平构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既不能脱离科学原理,又不能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外国经验。

新中国前一个时期的注重点在于如何在中国构建一个社会主义新制度并稳固和捍卫好这个新制度,之后紧接着就是如何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应该说,改革开放前的探索有所失误并走了弯路,犯过对书本的教条主义和对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改革开放后,彻底打破了这种教条主义,对社会主义认识上有很多突破,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发展成就。但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上一度面临考验,对西方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的新教条主义似的崇拜值得警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拒腐防变的形势严峻,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能否再次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新要求。

要深刻领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认知发展,有必要首先认真研究党的核心领导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论述。

## 一、中国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探索

### (一)关于前三十年探索的总体评价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评价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败得失: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时说:"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

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①

1985 年 8 月 28 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时，更为详细地述说这段历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②

1987 年 5 月 12 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时，将这段历史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同评述：“我们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道路。很长时期比较顺利，但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这个时期的后期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那个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6—137 页。

的失败。我们党被打入地下，被迫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个错误导致我们多数革命根据地受挫折，使三十万革命军队减少到三万。我们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被迫进行的。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赢得了胜利，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头八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础工业。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二十几年都搞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并且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①]

### （二）毛泽东的探索努力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领袖人物，对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成败得失有着重要影响，他关于如何搞社会主义的许多认知有个发展变化过程，其中因历史的和个人的局限有过错误观点，但也不乏后人沿用的真知灼见。这里仅回顾那些与后来的改革开放一脉相承的观点。

关于如何成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即当时说的在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1955 年 3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致词中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4—235 页。

时间。”[①]

1956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②]

1958 年 11 月 9 日—10 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并且批评道：“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③]

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就涉及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分给农民土地后，再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村土地合作化、集体化，所采取的是建立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形式，这个过程是否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民情？当时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因一刀切的政策和干部的急于求成心理，造成政府与农民关系紧张，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无法完成的状况。针对这些问题，1959 年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着重查找了问题的根源，指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8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95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64—865 页。

呢?”“他们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①]

这里涉及到至少如下几个基本问题: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状况下搞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按价值规律办事,采取与现实适合的所有制形式,克服平均主义、承认差别,按劳分配,积累与消费比例合理,权力不能过分集中。上升到认识问题上,就是没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密切联系起来,政策制定和实际工作中不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此,毛泽东于1959年3月9日也明确指出:“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有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②]

1959年12月——1960年2月期间,毛泽东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一系列谈话要点,其中包括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阶段和社

---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会主义也分为两个阶段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①

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中承认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还不足、缺乏经验，需要一百多年的努力才能赶超经济发达国家，要有遭受许多失败和挫折的准备，指出：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②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③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9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16—917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2—303 页。

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①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还明确提到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②并且指出：“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③

关于中国化和中国特色，毛泽东1956年8月24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不但马列主义要中国化，一切外国的东西也要联系中国的实际中国化，要形成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整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新东西。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④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1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1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08—809页。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认识和实践

### （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1. 过去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①]又在1985年8月28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③]另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⑤]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①]并说:"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②]"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③]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探索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

2. 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

立论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必须结合具体国情,即理论联系实际。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⑤]

立论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①]在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达成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此也就找准了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所在，所以邓小平在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才能自信地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②]并且指出，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

3. 现实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依据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时，论述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他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除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质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4. 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中国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

邓小平认为无论革命战争还是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中国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他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②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他同时承认经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也存在自身缺点和不足："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①]所以，社会主义要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②]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指出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两项根本原则：“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③]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再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④]

1987年6月20日，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指出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⑤]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向新推选出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交代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说:“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1]

5. 社会主义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提出既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和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2]后来国家提倡的“四有新人”、“五讲”、“四美”、“三热爱”等,都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作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的讲话,他说:“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3]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再次就精神文明问题提醒全党:“我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这样,也就很难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①]

6. 防范精神污染和变质,思想战线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注意到,在改革开放不久,思想领域很快产生了偏离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他提醒全党反对精神污染的现实迫切性,并且有专门的详细论述:

“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②]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

“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中……‘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①

“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崇拜。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②

“我们应当承认，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氛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③

“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4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 页。

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①

邓小平当时之所以一连串指出这么多问题，并不是言过其实，尽管他这么警告，紧接着还是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事件。所以，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甚至说：“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②1989 年 6 月 9 日，邓小平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③这实际上反映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经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面对的又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氛围，如何防止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发生复辟或变质，这是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消亡就是个例子，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依然面临考验。

###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发展和现实挑战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总结了邓小平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要领，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要观念。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就针对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群众路线、工作作风、反腐倡廉、社会风气、外交、军事等一系列方面提出新的具体要求。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断努力、认识上的不断创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7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6 页。

新，都是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其中所涉及的主要认识问题有以下方面：

1. 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对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实际上，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这种客观条件的“落后性”与共产党的“先进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它使党的先进性、合法性、科学性都面临考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执政党的建设目标必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保持一致。在补生产力这一课的过程中，共产党员能否保持住其先进性？应该具有什么标准的先进性？如何看待先进性与现实状况、与落后状况之间的关系？物质追求与精神力量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党员干部先进性的动力是什么？党实际代表了谁、依靠谁？党有无自身利益、党员有无自身利益？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和明确的答案。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大党老党在执政期间其政策大力推动了经济实力的增长，之后便被选民无情地抛弃下台。这就提出了另一个新问题：不注重民生不行，注重民生也不一定赢得民心。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它要求执政党要同时解决好发展民生和赢得民心的问题。中共中央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学习实践活动，也就是要恢复和保持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的鱼水之情，提醒党员干部认清自己的力量基础在哪里。

2. 商品经济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新要求。在对资源的配置手段认识上，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的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到20世纪90年代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是宏观调控作用，这充分说明，人们对于市场的重视度在不断提升。应该说，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的程度，是受制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落后呢？还是受制于外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市场氛围？还是在初级阶段之后依然发挥作用的长期效应？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拜物教等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现象到底与市场经济有多大关系？这

些问题还需要研究和回答。

3. 经济快速发展对精神文化提出新要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解决途径有多种，资本主义也是以竞争激烈和经济快速发展到超过前资本主义历史总量而著称的。然而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文化的消解也是迅速和彻底的，资本主义将唯利是图贯彻到底，封建的以“义”来压抑“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义”在“利”的强势冲击下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无地自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的利益驱动也会产生上述现象，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是，“义”“利”之辩一直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遍关注，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和冲突。另外，因为没有经历发达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彻底清洗，中国传统的东西还有留存，也会引发相应的“义”“利”之辩。所以，在当今中国文化场竞争角逐的有多股势力，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非常复杂的形势。具体地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尚的具体内容有哪些？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值得借鉴的精神文化是什么？前资本主义的传统文化中有哪些需要弘扬的优秀传统？未来人们的幸福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具体分析和厘清的重要问题。

4. 社会人的个体化对集体主义提出新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氛围中，经济资源包括人在内都要经受残酷的市场选择，这一方面释放并激发了人的个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简单化，迫使人向单向度个体化的经济人转变。而这明显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要求是相悖的。虽然到处都有集体性事件，比如政治竞选团体、经济利益团体、明星崇拜群体、事端制造群体、网络舆论群体等。但这些围绕的核心还是个体利益，与过去提倡的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护集体、献身事业等明显不同。如何消除互不信任的个体关系，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进而形成其乐融融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是需要大智慧的，也在呼唤具有社会主义理想者的集体智慧。

5. 生产力增长的无限性和基础资源的有限性对人类的欲望和理性提出了新要求。按照传统的认识，只要生产力和经济快速增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什么事情都好解决。但是，地球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望在不断刺激下会无限膨胀，终有一天会使地球有限的生存资源耗尽。过去人们寄希望于人类的理性调控，但已有的事实证明人类理性已经被资本的逐利本性所淹没。人类理性何时回归、如何回归，资本这头野马的缰绳何时以何种方式被人类理性所掌控，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过去被社会主义者普遍认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曾经被看作制约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现在似乎也面临认同上的挑战和实际上的解构，公有化运动何时以何种方式回归世界，公有制的最有效实现形式有哪些，这些问题也是有待未来的实践给出答案。

6. 科技发展、效率提高对实现充分就业提出新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化经历了工业化、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演进，高效节能、节省人力物力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机器代替人工的趋势日益增强。中国不但是人口大国，而且是农业人口大国，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是必然趋势，务农将不再是单纯的体力活，将不再需要大量的人力，大量的劳动力正从农村涌向非农行业，而各行各业的机械化、智能化也在减少人力数量，如果没有较充分的就业机会，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也将是个大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生产力越发达，一方面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越丰富，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运用越娴熟，人类的自由度越大。但是，无论到什么时候，人的劳动权力都不能失去或被剥夺，劳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所在。因此，在技术、机器、智能对就业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的进程中，如何实现充分的就业，将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项挑战。

总之，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是漫长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认知还在不断发展，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有待揭示，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还可能

会经历曲折历程，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实和未来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要求依然十分迫切，社会主义者的使命，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光荣和艰巨的。

# 第七章

#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当代命运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意义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认知中国的钥匙

我们都知道，认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仅要了解其现在，还有了解其过去，要理解其今天、预测其明天，就要知晓其昨天甚至前天。然而，当我们谈到中国过去的传统时，更多指的是古代中国的东西，也就是前天的过去，对于刚刚过去的昨天却不够重视，这个昨天就是百年中国人民的奋斗史，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去认真了解这段历史，怎么能说了解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就是从这个昨天走过来的。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经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并改造中国已经近百年，新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所以

说，无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真正认识和理解整个中国，就不会真正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大政方针和国情变迁，就不会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依据，就不会真正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内在统一关系，就不会真正理解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内涵。比如，以法治国是人人皆知的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但为什么要同时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而且正式的表述是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法治国来排序，这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搞明白的。其实，法治在历史上、在不同的国家都可能存在，只是法所维护的对象是不同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所维护的制度性质也是不同的。封建社会的法维护的是封建宗法制度（中国古代是封建礼法），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的权利和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其国体，任何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要以此为前提，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其政体，它具有制定法律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内在规定着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并且，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所以说，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内在统一的，三者共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架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是全方位多领域的，不仅仅有指导思想上的两次大的飞跃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有中国国情、国家面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中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民族区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中华大地无不打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烙印。因此，无论是从内部读懂中国，还是向外界解读中国，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主线，离开它就不是已读懂中国，就不是在正确解读中国，甚至是在歪曲、曲解中国。

## 二、马克思主义是先进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实现自我超越的思想武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价值立场受制于人的社会关系，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经济地位，包括拥有或支配生产资料在内的权利因素。在人类处于商品经济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私有财产权、多元价值观都是现实存在，人处在什么场景状况一般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倾向，这就是立场问题。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和多元价值体系并存，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此状况下，人们的立场自然各种各样，在立法、执法、行政和具体规范的设计、制定、操作中，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会有不同的指向，政策、法规就会偏向于维护不同群体的利益。比如说，作为私有企业主或混合所有制企业老板，他们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很难不去维护老板的利益；农民兄弟自然想的是他们的利益；既得利益者也不愿放弃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

如果人们都从自己的个人私利出发，如果私营企业主和从业人员都只顾自己发财，如果党员干部都羡慕别人发财牟利，那么谁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谁来考虑解放全人类？靠什么维持社会主义？怎样才能让人跳出自己当下的社会环境，放下一己之利，去思考全体人民的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呢？这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用先进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人类解放的未来前景，树立信仰，追求理想，为推进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奋斗。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有许多出生资本家、地主、上层社会的有志之士，能够背叛家庭出身，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为天下劳苦大众打江山、谋利益的原因，比如革命导师恩格斯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革命领袖，都曾出身富贵，他们勇于抛弃个人的荣华富贵和家庭财产，济贫济困，舍弃小我以实现大我。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似低潮期，在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强

势潮流和普遍私有化浪潮中，西方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四处传播，个人主义、唯利是图成为许多人的价值标准。在此不利环境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对于提升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确立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显得更为重要，可以说，只有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才能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实现个人认识上的自我超越，在整个国家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确保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知前提。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当代境遇

自从20世纪冷战格局结束之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步入困难时期，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数倒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普遍受到抵制，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能够感觉到无论国内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已经有所淡化，原来抱定共产主义信念的许多人已经开始动摇。虽然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但社会生活中也存在某种去马克思主义化的不良倾向。如何看待这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呢？首先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并透过现象看现实世界的本质。

### 一、世界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方面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兴起和资本扩张使各民族历史逐渐转变、发展为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揭示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近代变革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另一方面论证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进程，揭示了世界历史是世界体系相互作用和一系列革命运动（包括科技革命、社会革命）的结果，并将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目标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每一个单个

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①]，"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②]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在揭露世界殖民体系的民族压迫性质和帝国主义的剥削本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封建主义国家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从而引起了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革命，在之后的百年时间，世界范围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都受此思想变革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并客观上至少产生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三大成效：一是促进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意识的觉醒，推动世界范围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并最终使得国际殖民体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彻底土崩瓦解，现代主权国家得以全球林立；二是广大劳动群众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的唤醒，无产阶级参与和领导各国民主革命运动，世界上诞生了一批社会主义新主权国家，从而冲破了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防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同发展；三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一针见血的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给予资产阶级教训并引起反思，迫使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改良，从而不同程度地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动荡局势，延缓了资本主义的衰亡进程。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对世界历史百年进程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已经化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事革命斗争和变革世界实践的精神动力。

然而，在 20 世纪后期，随着国际殖民体系的崩溃，国际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高潮告一段落，主权国家在争得政治独立之后立刻面临经济发展的新生存竞争，与此同时，世界历史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掀起跨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8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87 页。

国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借助经济全球化之势，资本霸权取代武力霸权开始其主导世界的时代，“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方使生产方式服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①]西方新自由主义也借势不断扩展其影响，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②]。在此浪潮和背景之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失利和改革失败而引发社会制度的巨变，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倒向资本主义轨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这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和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所有这些构成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式微的世界历史阶段性大环境因素。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诸多弊端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性，世界历史依然将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轨道前行。

##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良解读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集立场、观点、方法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它建立在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和认知基础之上，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集大成，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的历史实践活动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统一，从而赋予它科学性、开放性、辩证性和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特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完美和博大精深，要求认识、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们必须具备很高的素质和条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经典作家本身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就要求能够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者更需同时具有渊博知识的理论造诣和注重实践的超强能力。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有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错误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读，好在马克思、恩格斯及时予以批驳和反击，在面对当时的假马克思主义时，马克思甚至自嘲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良解读和错误认识更是猖獗，其中有来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恶意攻击和故意歪曲，也有来自欧洲社会主义者内部的曲解和误导，加上客观上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制度改良、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心收买策略和个人贵族的意志消磨等影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信念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好在列宁主义及其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重振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雄风，也对欧洲修正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批驳和反击，从而掀起了20世纪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

然而，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良解读和错误思潮传播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或学者的解读更具有误导性。这其中主要有：20世纪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学派的影响；"新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解读。它们或者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单纯的批判理论，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容易被理解为与现实对立的理论而遭到抵制。它们或者仅仅作些纯粹文化改造的呼唤，妄想以文化来改造社会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在资本主宰的社会中其实际效果总显得苍白无力。它们或者以某种生命政治权力理论来替代科学社会主义，所要彰显的是欲望、肉体等所谓人性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社会化、社会关系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内容都改写为生命、欲望等主观的人性概念，其结果更加助长了物质主义的猖獗和资本主义单向度人弊端的扩张。毫无疑问，这些错误思潮产生的危害十分严重，它们模糊了人们的视线，消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威力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精神动力。

20世纪新诞生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循，甚至缺少有益教训可鉴，因此难免走弯路，而且在理

论和实践上都犯有严重错误。比如，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新生的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长期都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苏联在列宁之后试图长期垄断马克思主义解释权，造成体制僵硬和政策失利、改革失败，最后指导思想上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终于葬送了自己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中国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和灾难，"文革"之后，对"文革"极"左"路线的批判反思，使人们重新回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轨道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有了更为科学的理解。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在炙热的革命热情冷却之后，人们原来的信仰系统也遭到解构，甚至是一次几乎全社会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解构。加上外部苏联、东欧一批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发生巨变产生的不良影响，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扩张时期，世界市场依然处在资本主义主宰的环境之中，正如前面马克思所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和扩大开放步伐，并促使人们加快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的同时，也为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教信仰等思想观念的输入和传播大大增加机会，其结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势冲击，在去意识形态化的波浪中，所去除的也不仅仅是极"左"思想，往往也包括一部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其结果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许多人心目中已大打折扣。随着这种意识形态和理想信念的淡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片面甚至错误理解也越来越常见。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就等同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等同于平均主义，或等同于极"左"，已经不合时宜，许多人不愿再提马克思主义，深怕被贴上"左"和"保守"等标签，有些人在认识上则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割裂开来。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

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

## 三、“核心”与“社会流行”之间差别扩大化的现实环境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核心”与“社会流行”之间差别的扩大化。我们都能感受到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流行的所谓“大众文化”的口味，可以用“俗”、“肉感”、“快餐化”等字眼描绘。这种差别怎么造成的？这就要与我们所处时代的环境因素相联系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各种称呼，比如后殖民时代，或后冷战时代，或经济全球化时代，但实质上依然是资本扩张的世界历史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上资本追逐利润的竞争加剧，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不断被制造出来，由此产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极为不利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一）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去政治化”或“政治失忆症”的不利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Terry Occulting）指出[2]，政治失忆症就是忘记了理论的历史和政治维度，政治事件被转化为纯粹的知识事件，消费文化淹没了政治文化，对现实的关注解构了原本的理想。虽然主权国家在20世纪后期已经是全球林立，主权国家体系也真正达到了全球化，但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从对政治解放的理想信念转化为追捧资本主义的信条。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总是与政治密切联系的，去政治化或政治失忆必然严重挤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空间，于是，在许多人看来，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似乎不再合乎时宜了，过去的革命战争历史不是被遗忘，就是被按照消费文化的模式重新解读，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无疑具有致命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② 参见何卫华、谢海燕：“理论之后：‘后理论时代’的认知测绘”，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3期。

（二）现实正在发生的经济全球化似乎带给人们的生活方式认同与文化认同上的不同要求，在资本所推动的生活方式同质化的同时，又过于重视和强调价值观认同的"多元"，淡化或回避社会共有的东西，包括共同文化、共同价值等。我们都能够感觉到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话语影响，生活方式的同质化似乎在打破差异。另一方面，对多元价值的包容也已经形成共识，但这种多元又不断产生群体间的认同隔离，人们往往以宗教、种族等身份符号为各自群体的标识依据。这种多元价值和认同隔离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必然构成麻烦，甚至出现主流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体系仅仅停留在官方倡导的层面，官方的主流与民间的或群体自我认同的主流往往并不一致，即便是学术知识也是如此，比如，在当今中国，主流经济学到底是指官方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还是指经济学界普遍追捧的西方经济学呢？我们能够听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指向或认同。

（三）和平时期的社会结构调整或社会变革在策略上也存在很大问题和不利因素。一是强调微观改革，忽视宏观叙事，强调经验和感官的具体，忽视宏观的理论抽象。当局者仅仅关注当下，政策太"现实"，理想层面的东西自然就会少，意识形态就必然束之高阁，在这种状况下，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全球性变革和人类政治理想就会遭到怀疑、否定甚至拒斥；二是当下的实践虽然不断创造着物质财富，却往往缺乏道德感召力。一项社会工程或事业，只要能够激起物质或精神欲望，就很容易产生最广大的群体动员力。具备强大的社会道德感召力的事业才能够培育良好的精神氛围和促进社会积极向上的文明进步，反之，仅仅刺激物质欲望的举措，如果不具备道德感召力，不仅会造成道德人伦丧失或败坏社会风气，而且会导致信仰和神圣感的失落，从而使作为具有精神追求的社会人沦为动物本能最大化的个体性张扬；三是因过于强调当下实践，往往将真理的绝对性等同于教条主义加以否定。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改革或变革的必要前提，但有时也导致否定绝对真理的后果。对绝对真

理是否存在本来就有来自不同学派立场的不同意见和争议，即便在承认绝对真理或真理的绝对性之后，要在实践中将坚持真理与教条主义区分开来还是有难度的，需要相当高理论水平的支撑。一般来说，意识形态就是以普遍性或绝对真理的色彩呈现出来，并试图成为人们深信不疑的真理追求，一旦意识形态与教条主义印象挂起钩来，就会让人敬而远之，不敢随意触及，更不敢大张旗鼓地宣扬了。

总之，现实环境条件的改变，带来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了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又反过来强化着现实状况的合理性存在，这同样适于说明意识形态变革及其所起的反作用，所以恩格斯指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①]而要跳出这种现实状况及其观念的局限，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寻求真谛。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 一、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一脉相承和点睛之笔

中国梦无论作为理论概念还是作为蓝图规划，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一脉相承的必然产物，同时，中国梦的提出又有其自身的独特内涵和时代意蕴。

第一，中国梦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宏伟构想。中国共产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59页。

党领导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勾画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力图早日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构想和提出了从1980年到2050年的中国发展的“三步走”目标。在这一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构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创立和完善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更加明确提出了“两个百年”的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号召。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并全面吹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角。

第二，中国梦的提出是在整个中华民族复兴欲望日益强烈时刻的顺民意点睛之笔。中华民族复兴在百年前就是中国仁人志士的美好愿望，但长期的积贫积弱也让过去的许多志士在有生之年看不到希望。新中国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富起来，让人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的增大，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唤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一致而且强烈的欲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领导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顺应民意，不失时机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响亮号召，就像画龙点睛，为中国这条百年沉睡的“中国龙”增添了腾飞的力量，中国梦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点亮了一座灯塔，中国梦号角的吹响，让世界华人的目光凝聚在一起，投向未来，朝向远方。

第三，中国梦是具有统合性、能够激发社会进步正能量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民族精神之魂，是社会进步的正能量，缺少理想信念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特别是在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出现了多元化，西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影响之下出现了物欲追求、自私自利、贪图享乐的消极腐败现象，黄赌毒开始浮

现，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也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断改善，但精神文明的期盼成效迟迟未出现，甚至可以说人们的精神层面是压抑的，因为中国人在古代有过悠久的修身治国的德化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过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追求，人民群众的社会良知和道德忧患意识是不甘于泯灭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处于攻坚克难之际，整个国家需要有统合性的理想呼唤来防止人心涣散，整个社会需要积极向上的理想信念来激发社会进步的正能量。此时此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这种具有统合性、能够激发社会进步正能量的理想信念。可以说，中国梦的提出确实顺乎了我们时代的潮流，适应了国家形势发展的需要，满足了社会现实的需求。

第四，中国梦实现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大众化、世界化语言对接。中国梦是有价值内涵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理论支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在现实依然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的局面中，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但是，要取得这种引领的成效并非易事，因为各种思潮的成败在于获取的人心数量，而借助或占有大众话语优先权是最隐蔽最有效的方式。于是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强占人权、自由、博爱等强势话语权来掩饰其兜售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价值观的企图，很具有煽动性和传播效果。即使一些邪教也往往打着行善、友爱、兄弟、姐妹等旗号来传播教义、蛊惑民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属于先进文化，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期，无论国内外都处在各种敌对思潮的围攻氛围中，特别是在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将大众文化庸俗化、快餐化、物欲化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话语体系已经与大众文化不知不觉产生了距离，语言优势越来越小，由此可见，话语引导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话语引导就是思潮引导的一个关键环节，而话语引导就需要进行话

语对接，采用朴实的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往往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我们欣喜地看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在自己的语言上率先垂范，他们朴实的语言风格一下子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也树立了亲民务实的优良作风。其中，中国梦的概念就是中华民族共同理想的大众化表述，它能将古老的民族传统与现实的理想信念接通，能将中国共产党人的梦与每个家庭的梦、单位的梦、个人的梦联系在一起，能将中国梦与世界梦、各国梦相互对话。它是一种大众化、世界化的语言表达，所以能够在国内国外产生广泛共鸣。

## 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是中国梦的基本原理和行动指南

如果说中国梦是一个宏伟蓝图、一座宏伟大厦，那么，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就是这个宏伟蓝图的基本原理，就是勾画这座宏伟大厦的理论支柱。中国梦不是空中楼阁，是可以实现之梦，是理性之梦，是理想信念，凝结人类智慧，包含丰富的理论内涵，中国梦不仅仅内涵一定的理想信念，而且内涵实现理想的现实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重要文件，从中不仅可以找到当代中国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的答案，而且可以从中找到“怎样实现理想”的答案。总书记一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在对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趋势与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华民族的复兴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新时期的中国梦赋予当代中国工人、农民、青少年、军队等各行各业劳动者以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发展动力，赋予世界大国以新型关系，赋予中国共产党以更加从严治党的执政要求。因此，中国梦的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之所以是中国梦的基本原理，是因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梦。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华民族危亡之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成就已经表明，在和平发展时代，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使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人民幸福、世界和平，从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要真正解读好中国梦，就要正确理解其基本原理，就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基本原理是关系全局的最根本最核心的主导性理论内涵。

## 三、近现代世界大国崛起的规律性要素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是否存在必然性；第二，是否具有独特性。只有存在必然性，才能顺势而为，才具合理性、规律性，才能成功实现。只有正确认识自身的独特性，才能立足自身国情，有的放矢，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民族复兴道路。为此，有必要在回顾总结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和民族国家强盛的规律性要素的基础上，再深入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必然性和独特之处。

### （一）主权独立与统一市场

主权是现代国家的标志性特征，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所在，而大国崛起或国家强盛往往是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而言的，国家主权独立对于国家强盛或民族昌盛的重要性可以从三个最基本的方面加以理解。第一，主权不独立意味着依附于人，从而失去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自由。第二，主权本身就是一种实在力量，国家主权独

立是国家自强的力量体现，而且是保障力量，所以我们常说，没有强大的国防，哪有国民的幸福安康。第三，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必须实现国家强盛，从而激发民族复兴的欲望和整个国民的斗志。所以，近现代欧洲强国的兴起都是从争取主权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开始的。

国家强盛的基础是国富，从历史上大国崛起所表现出的国家主权与国家富强的关系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分别表现为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政策干预。在国内方面，比如德国，作为相对于英国、法国来说后起的现代国家，在完成主权统一之后，为了走一条现代化赶超道路，德国通过强化政府作用实施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创办或资助各种企业，并制定了农业与工业之间保持平衡发展的政策，从而聚集起丰富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充足的资金和劳动力。对外方面，英国最早采取的是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政策，强调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从而达到尽可能多地积累金银财富和国家实力的目的。在形势变化之后又转向采取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尽可能向世界拓展其经济影响。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才实现了真正的主权统一，也是真正实现经济独立发展的开始，而国家所采取的是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过贸易保护来扶持本国幼小产业的成长，推进本国工业化进程，在短短30年时间里，美国从一个落后于英国、德国、法国的后发国家，迅速壮大到世界头号工业国，其工业产值几乎相当于英国、德国、法国三个主要工业国工业产值的总和。当然此时，美国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的时机也到了。

第二，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实现经济富强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主权国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主权独立也为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现代民族国家在获得主权独立之后，最需要做的事就是为统一国内市场、整合国民经济扫清障碍。美国在独立战争从英国赢得政治上的主权独立之后，又为了统一国内市场不惜爆发南北内战，国内市场的统一使得美国的国内市

场大于当时整个西方市场,才为上面所说的美国贸易保护经济政策和强国之路铺平道路。一般来说,国内市场规模是决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因素,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受阻的环境之下,统一而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是国家实施灵活贸易政策的优势条件,也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潜能所在。

### (二)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在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得到印证,也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反复印证。

一方面,几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造就某一个或几个大国的迅速崛起,近现代以降所发生的物理学发展和蒸汽机发明,化学和内燃机技术的发明,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火药运用于武器和军事革命,铁路技术和运输革命,航空技术和航天工业革命,无线电技术和电力通讯革命,生化技术和石油工业革命,标准化技术和制造业革命,电子技术和计算革命,核技术和武器革命,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革命,包括管理学和市场经济组织、营销范式革命等,分别成就了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日本、前苏联、美国等国家的迅速崛起。可以预见,当前发生的以3D技术为标志的新一波科技和工业革命,也必将推动那些新型国家的迅速崛起。

另一方面,落后国家的崛起,往往都是借助于当时最新科技革命浪潮,顺势而为,利用后发优势和老牌强国变化缓慢的惰性,迅速将新科学技术应用于产业经济,发展新经济,在产业的升级换代上走在最前列,强占产业技术或管理技术的制高点。我们知道火药是中国最早发明的,但火药被欧洲运用到枪支大炮之后,才引起一场军事革命,其结果是欧洲列强武力打败中国并称霸世界。这方面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很有特点。当时他们的崛起并不是科技革命首先发生在自己国家,而是他们利用了新技术迅速实现了产业升级,培育了自己的战略新兴产业,包括组织管理的创新。比如,美国的标准化、通用零部件的生产和流水作业,使以汽车制造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实现了更新换代,确立了美国战略新兴产业

的国际领先地位。日本的现代化赶超战略、企业管理和自主创新战略，以及后来的电子产品生产的世界领先优势，使日本迅速超越欧洲传统大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是说，科技革命是根本动力，但能否借助科技革命进行产业升级，形成世界领先的战略新兴产业，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则是经济振兴和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

（三）世界重心转移与战略机遇

世界历史的开创不只是哪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自身孤立发展的结果，世界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定不变的中心，某一地区甚至国家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中心（重心）或政治中心（重心），不能说成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壮举，而是一系列科技革命、政治革命等的相互作用使然，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①] 对世界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经济及其活动中心（重心）总是要转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远见这种中心的跨地区和跨时代转移，[②]并以世界贸易中心为例指出这种中心从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转移到当时的伦敦和利物浦，并继续转移至纽约和旧金山，将来随着交通的发展会转移至太平洋两岸，也就是说世界经济、贸易中心将从欧洲、北美转移至亚太地区。毫无疑问，处在世界中心（重心）的国家就容易成为当时崛起的新兴大国，所以我们看到，先有欧洲强国（及其盟国）的崛起，后来是美国的崛起，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又会有一批新兴国家崛起。一方面，大国崛起不可能被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所垄断，随着世界历史进程和经济中心的转移，不同地区都将会出现新崛起的大国，这是不以某些老牌大国强国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全球主权国家林立的新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新一轮的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信息中心也正在发生位移，也很可能出现多种中心，这就为处在有利位置的国家或地区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页。

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的国家将顺势崛起,我们相信,在此情形下,新崛起的国家将不只是某一个国家,而是将有一批新兴国家先后崛起。为此,要积极关注世界经济活动中心或重心的变化,认清形势,适应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利用好战略机遇期,选择科学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大力推进本国或本地区发展,努力实现民族复兴大业。

(四) 国际危机与制度创新

一个政治或经济中心转移,一个帝国或霸权国家的衰落,一个新中心的形成,一个新的大国崛起,一个民族的复兴,都是有特定历史条件的,其中危机就是一个重要条件。回顾人类历史,危机可以葬送一个帝国,也可以重塑一个新的帝国。自16世纪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扩张,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历史逐渐转变、发展为世界历史,从此,国际危机每隔一段都会发生一次,每一次大的国际危机往往葬送一个老牌强国,又为新的强国崛起提供了难得机遇。昔日欧洲内战和殖民战争曾使欧洲列强轮番衰落和崛起,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最终葬送了欧洲老牌强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为美国和前苏联迅速崛起并上升为霸权国家提供了契机。

近现代国际危机分别来自经济、政治、军事冲突所造成,但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危机必然性。现代性的资本特征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并将新的关系向全球推进,世界历史在增进世界交往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同时,资本的必然趋势却是在一切地方使生产方式服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从而相对于人类利益的普遍性要求,资本主义越来越显示其狭隘性。资本扩张造成民族及国家之间的对立、压迫、剥削、贫富分化等一系列导致危机的因素,也给落后国家或民族不断带来挑战和刺激,并使现代生产力在不同国家间呈跳跃式发展,因为国际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会加速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也会加速国内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促

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交往方式的更新换代。在交往普遍化的情况之下，落后国家面临的这种更新换代形势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和相似性，对于落后国家来说也是跳跃性的。

应当说，危机往往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时机，在历次危机中通过制度创新走出危机甚至实现跳跃式发展或国家崛起的也屡见不鲜，然而，在资本所主宰的世界历史初级阶段，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危机的问题，从而开始酝酿下一次更深层次的危机，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自发的、异己的社会力量对人的奴役不断增强。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也就是说，随着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认识的发展，人们对历史创造的自觉成分越来越多，制度创新也越来越向着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物化的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越来越向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行。

## 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性与中国特色中国梦

中国梦的实现既有符合世界历史规律特别是大国崛起规律的普遍要求，也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条件。

###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从合乎大国崛起规律性方面来看，中国已经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并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日益增强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也具有强大的国内社会动员力。

中国国内市场统一且市场巨大，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394页。

机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腾飞举世瞩目，而且未来依然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

新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科技革命不断带来产业升级方面的巨大挑战，与此相适应，中国确定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将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21世纪被普遍认为是亚太中心并且会有一批新兴国家崛起，中国也事实上成为这批新兴国家中的突出一员，21世纪能否成为中国等一批新兴国家的世纪，世界重心的转移已经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爆发次贷危机到爆发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已经带来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可以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危机的全球化也在深化扩展。谁能避免危机、化解危机，谁就能成功复兴崛起，金融、经济危机提出了制度创新的要求，具有优越制度的国家才能走出危机和走向崛起、复兴之路。

中国虽然面临着严峻的资源能源挑战、生态环境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世界经济危机挑战以及国际政治、文化、军事等环境的压力，但中国不采取西方转嫁危机的方式，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等老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就是要尽量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危害，避免中国经济陷入发端于西方国家的国际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泥潭，并借助于国际危机提供的转型契机，通过艰难的制度创新和转型发展，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梦的内在支撑和强大优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强大的认同力，它是海内外中国人的普遍向往和热切期盼，是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在过去面临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努力；在新的

历史时期，民族振兴则是全世界中国人重新拥有的共同梦想，是民心所向、众心所向，“人心齐，泰山移”。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梦的内在支撑和强大优势。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国梦营造了长期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战略取向，不是走昔日大国崛起的战争掠夺和霸权扩张老路，而是走和平崛起、构建和谐世界的新路。在国内改革发展上，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国内政治的长期和平稳定，而和平环境与政局稳定又是集中精力搞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政治优势。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国梦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决定国家强盛的因素中物质财富的筹码固然重要，但社会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更为根本，其中社会和谐和社会凝聚力是民族兴旺、国家兴盛的重要体现，可以为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科学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从根本利益上确立了国民与政府的相互一致性，从而增强了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国梦营造了机制灵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发展潜力。在人类社会历史进入商品经济阶段之后，市场就成为重要的资源配置和调节手段，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大国崛起往往依赖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往往囿困于市场的萧条而走向衰落，虽然他们在世界上叫嚣和推销自由市场教义，但常常根据需要对外采取保护主义，在市场屡屡失灵的情况下也不得不采取政府干预，只是因为私有制下巨大的资本力量让这种干预不得善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手段，同时为了克服市场的盲目性而实施政府的宏观调控，这与西方资本主义表面

上的小政府大市场不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既可建立起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又可建立起发达的政府调控体系。随着两种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国梦营造了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思想活力。民族的集体智慧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是否有前途往往取决于其发展理念、思想观念、民族精神等反映民族灵魂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精神、首创精神，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思想成果，并构成中国梦的基本原理和行动指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正是得益于这些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思想活力，这些也必将成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优势。

# 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第一版。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2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2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2006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选编》，学习出版社 2007 年版。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孙中山文萃》下卷，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张太雷文集(续)》，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年版。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5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钟家栋、王世根主编：《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告读者

尊敬的读者：

欢迎您阅读本书。学林自出版平台（www. xuelinpress. com）为本书读者免费提供下列服务：

1. 对本书内容进行全文检索。

2. 了解互联网上各主要网站对本书的评论。您也可以发表对本书或本书作者的评论，与其他读者沟通。

3. 查看本书作者的详细情况。您可通过站内信等工具与作者直接沟通。

4. 查看本书责任编辑的详细情况并与编辑直接沟通。

此外，如本书市面上已无法买到，www. xuelinpress. com 为您提供付费定制服务，一本起印，价格不高于本书定价。

我们将陆续推出更多服务，欢迎您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学林出版社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本认识和实践
作者=曹泳鑫著
页数=167
SS号=13813222
DX号=
出版日期=2015.01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